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ext Scan Input Form - Title Page

Work:	W1KG16568	ImageGroup:	I4PD4437
LCCN:	n/a	ISBN:	n/a

Title:	??????
Author:	n/a
Descriptor:	n/a
Original Publication:	n/a;???
Place:	??
Publisher:	???????
Date:	1984
Volume:	1
Total Volumes:	1
TBRC Pages:	2
Introductory Pages:	n/a
Text Pages:	n/a
Scanning Information:	Scanned at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150 West 17th St, New York City, NY 10011, US.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马村书
嘎降藏

马村书
嘎降

马村书
嘎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科学哲学史

第二卷

科学哲学史

科学哲学史

科学哲学史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目 录

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藏汉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

..... 来作中 江安西 邓珠娜姆 书刚 (1)

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

..... 邓珠娜姆等提供资料 来作中执笔 (11)

甘孜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世系及其兴衰经过

..... 松吉邓珠口述 郎加 书刚翻译搜集 来作中整理 (18)

从“大白事件”到“岗拖协议”

..... 来作中 书刚搜集整理 (31)

川康二旅“康定兵变”纪实

..... 兰文品 (40)

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

..... 白马邓登

夏克泽郎口述 郎加 书刚翻译记录 来作中整理 (44)

炉霍政教合一的大祈祷法会

..... 郎加 泽呷提供资料 来作中整理 (62)

石渠县温波喇嘛寺叛乱经过

..... 土热 (10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

藏汉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

朱作中 江安西 邓珠拉姆 韦刚

康区，是康、藏、卫三区之一部，古称“喀木”。其疆界东起二郎山，西至丹达山，南邻云南，北接甘青，包括今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设治时间，据有关史书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于边外（今泸定以西）设都尉，建沈黎郡（包括今汉源、泸定、九龙一带）；魏晋南北朝时，属蜀郡、益州；唐时设羁縻州，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清初属四川管辖；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设打箭炉厅，隶雅州府（今雅安）。

清朝末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置流官统治），收缴了历代封建皇帝敕封给当地土司（宣慰司、招讨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呼图克图（圣者之意，是皇帝对极少数高僧敕封的崇高地位和称号）的印信号纸，先后奏请在当地设立了康安、边北两道，康定、巴安、邓科三府，甘孜、白玉、德格三州，三坝、理塘两厅，盐井、定乡、稻城、河口、石渠、同普六县，乍丫、昌都两理事官，得荣、江卡、贡觉、桑昂、杂瑜、三岩、章谷、道坞、瞻对、泸定、硕般多、达威等十二个设治委员。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傅嵩林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奏请建立西康行省，定巴塘为省会，修建公署。后武昌事起，宣统让位，建省之议，未成事实。

民国初年，改上述地区为川边特别区，裁撤府、厅、州、理事官、设治委员，统一县治。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不断发起东侵，占据了金沙江以西和金沙江以东的新龙、德格、甘孜地界。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将康区改建西康行省，设立“西康政务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十月，刘文辉和达赖派谈判委员在岗拖举行谈判会议，签订了以金沙江为界，分驻藏汉军队的六条协议（即岗拖协议）。至此，在康区原来所属的三十三个县中，金沙江以西的十四个县，实际上已为西藏地方政府所控制。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一九三九年一月，建立西康行省，定康定为省会。

一九五〇年三月，康定解放，十月，又解放了昌都，十一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以康定为首府组建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嗣后，中央又以昌都为中心，成立了昌都解放委员会。至此，原来康区所辖的县，分别归由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和昌都解放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更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同年十月，西康并入四川省，原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也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辖二十一个县。一九七八年撤销邓柯、义敦、乾宁三县，分别并入石渠、德格、巴塘、理塘、道孚、雅江等县。现甘孜藏族自治州共辖十八个县，总面积十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一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人（一九八二年六月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有藏、汉、彝、回、纳西、苗、羌等民族，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

现将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藏汉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简介如下：

康定：县城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距成都三百六十六公里，旧名打箭炉。

关于打箭炉名称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说是诸葛武侯南征孟获时，曾命大将郭达在康定安炉造箭，因而得名。但对这一传

说，历来有不同的见解。理由是诸葛亮南征时，并未经过康定，史书上也未查到有关郭达其人的记载。康定虽有所谓的“郭达将军庙”，但所供神像是藏系佛教的护法神当钦（དཔ་ཅན）。传说中的“当钦”，铁匠出身，坐下骑羊，手持皮火筒（藏族烧篝火时的一种燃工具），为藏族铁工供奉的神像，喇嘛教称之为“骑羊护法”，与郭达无任何联系。另一说法是，诸葛亮南征时，为解除后顾之忧，曾商请康区酋长让给“一箭之地”，并在郭达山顶插箭为凭，作为藏汉交界处所。这一说法，也无史籍可考。第三种说法是，藏语称康定为“打折堵”（དར་རྩ་ཅན）、意为“打曲”（汉名为雅拉河，因是从藏名称为“达布拉”（ད་པ་ལ）汉名称为大炮山山脚下流出来的，故称为“打曲”）和“折曲”（汉名为折多河，因是从藏名称为“结妥”（རྩ་ཅན）、汉名称为折多山脚下流出来的，故称为“折曲”）二水相汇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是，打折堵的“打”（དར）字，意译为旗，“折”（རྩ）字意译为尖，“打折堵”合译，为“旗尖的交叉口”，这一译法又符合喇嘛教对康定环城的郭达山、跑马山、阿里布果山分别称之为密宗事部三怙主（རྩ་ཅན་གསུམ་པོ་ཅན་པོ）：金刚部金刚手（郭达山）、莲花部观音（跑马山）、佛部文殊（阿里布果山）神山及其山颠均竖有“麻里旗”、而康定又位于三山交叉之口的解释。后两种传说，都有一定道理，应以何说为准，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关于康定的设治，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康定属牦牛县管辖；唐时置土司统治；元朝隶属青海；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一四〇七年），康定土司阿旺坚赞因随征有功，册封为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在当地建碉设市；清雍正年间，在此设打箭炉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废府设县；一九三九年一月伪西康省政府成立，设省会于此；一九五五年随西康省建制的撤销，复划归四川。

泸定：位于康定以东，距康定四十九公里，大渡河纵贯全

境。因大渡河又名泸水，故取名泸定。藏语因此地为山谷地带，称为“阿垒(ར་ལཱ་)，汉译为“安乐”。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一七〇六年）在大渡河上架设了巨型铁索桥，藏语又称之为“甲桑卡”(ཇམ་སང་ཁ་)，意为铁索桥畔。据记载，泸定在晋代属晋乐县，唐属大渡县，明清年间，是沈边土司（据记载其始祖为江西吉安人，明洪武年间，随征有功，被授为沈边长官司）、冷边土司（据传其始祖是藏族瓦述部落酋长，明成祖永乐八年，即公元一四一〇年，被授为冷边长官司，迁来此地）、咱里土司、化林坪土司（其始祖原为明正宣慰司之守备，以随征有功，于清乾隆十年，即公元一七四五年被册封为理塘宣抚司，乾隆十二年，改任理塘额外副宣抚司，二十二年，又移住化林坪为土司）驻地。历设巡检，隶属打箭炉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设委员治理，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改县至今。

雅江：位于康定以西，距康定一百四十八公里。藏语称其地为“娘区卡”(ཉལ་ཁུ་ཁ་)，即雅砻江畔之意，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在此设渡口，汉语称之为“中渡”。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在此设外委一员，率兵镇守。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改流时，划东部明正土司辖地和西部理塘瓦述崇喜土司辖地，设河口县，隶属康定府。民国二年改称雅江县至今。

九龙：位于康定西南，距康定二百五十二公里，历史上为明正土司辖地。因当地有一结索寺，藏语即以寺命名，称为“结索”(ཇམ་སང་ཁ་)。汉语则因其地有菩萨龙、三岩龙、雪洼龙、麦地龙、三丫龙、八窝龙、速窝龙、洪坝龙、湾坝龙（藏语“龙”ཇམ་为山谷的意思）之称，故称为九龙。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设九龙设治局，隶属康定府。民国元年设县至今。

九龙县除藏、汉民族外，还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彝族。盖因早在一七八〇年前后，凉山喜德县境内，有兄弟二人，不堪奴隶主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迁居到九龙谋生，以后逐渐增迁新

户和子孙繁衍，达到了现有人数，占据了大片土地。

丹巴：位于康定以北，距康定二百二十五公里。该县地处高山峡谷，藏语称其地为绒麦章古(རེ་མེ་གར་ཁག)，意为山岩上的城。汉名根据当地有丹东、巴旺、巴底土司，称之为丹巴。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置设治委员，后改县，隶属康定府。

道孚：位于康定西北方向，距康定二百二十公里。历为康定明正土司及丹巴革什扎、瓦述鱼科、霍尔孔萨、麻书、章谷六土司交界之地。藏语称其地为“大巫”(ཏུ་མ་)，意为当地地形如马驹。汉语根据译音称为道坞。清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设果洛汛，置把总一员于此。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置道坞委员，民国元年称道孚县至今。

理塘：位于雅江以西，距康定二百五十八公里。因其地以宽广的毛垭坝为主，藏语称之为勒塘(ལེ་ཏང་)，意为铜镜似的草原。汉语根据译音称为里塘。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设里塘钱粮总管府，明称里塘都，清初一度改名顺化，雍正时设里塘粮台，后改称里塘军粮府，分别置僧俗营官(俗营官即正土司，僧营官为副土司)和汉族粮务(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外委(二员)共同管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改流，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设理化厅同知。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为理化府。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易里为理，改称理化府。一九一四年废府设县。因理化有同化、强化的意思，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恢复理塘名称。

巴塘：位于理塘以西，距康定四百八十三公里。汉时为白狼羌驻地，与西藏、云南隔金沙江为界。

巴塘名称的由来，据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人牵着驮干粮的羊子，到处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到了巴塘看到那里气候温和，地沃草肥，决定留住下来。这时，恰遇羊子吼叫，于是以羊子的叫声为寓意，取名巴塘(པ་རྩ་ཏང་)，即羊子叫唤的坝子。汉语根据译

音，称为巴塘。

巴塘早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五十八年至七十四年）即同内地有较多的往来。为川、滇、藏商聚集经商之地，是康南经济文化中心。元世祖（公元一二六〇～一二九三年）时，在巴塘置招讨司，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巴塘土司扎什彭措（འག་ཤེས་པུན་ལོགས་པ་）随征有功，册封为宣慰司。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在巴塘置都司、千总、把总各一员和粮务委员。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流，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设巴安府。康安道也驻于此。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废府改县。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复改称为巴塘县。

稻城：位于理塘之南，距康定四百三十二公里，历为理塘土司辖地。藏语称其地为稻坝（འདབ་པ་），“稻”（འདབ）在藏语中为沟尾的意思，是山谷夹溪的地方，“稻坝”意为山谷沟口之地。汉语根据译音称为稻坝。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流，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置稻坝委员，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设稻城县，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复将曾于光绪三十四年设置的贡噶岭县丞并入至今。

乡城：位于稻城以西，距康定四百八十八公里，历为理塘土司辖地，由于该地有硕曲与定曲流经全境，沿河两岸都是相对称的村寨，故藏语称其地为“卡称”（ཁ་ཤིང་），汉语据其译音，又根据乡城所在地有桑披喇嘛寺，院墙高垒，俨然城廓，故称之为乡城。

据记载，乡城在元、明时期，即已设官治理。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乡城桑披寺僧众叛乱，旋被平息，实行改土归流，设县置官，取名“定乡”，隶属巴安府，一九五一年，复根据藏语译音，改称乡城。

得荣：位于乡城以西，隔金沙江与云南相望，距康定六百三十五公里，境内气候温和，适宜农作。藏语称其地为“得荣”（ཐོ་རྩེ་），意为地势较低的农区。历为巴塘土司辖地。清宣统三年

(公元一九一一年)设得荣委员，民国元年改县。汉语根据藏语译音，称得荣县。

炉霍：位于道孚以西，距康定二百九十一公里。据传因当地土司系蒙古族后代，故藏语称其地为霍尔章谷(ཧོར་གྲག་ལཱ་གུ་)，意为霍尔章谷土司的官寨在此地的岩头上。汉语根据藏语译音，称为章谷。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章谷土司绝嗣，清政府置委员管理。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设炉霍屯(一说是因治所为炉水和霍水汇流之处，一说是因其地为打箭炉至霍尔五部及西藏的必经要道，故称为炉霍)，隶属打箭炉厅。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改县至今。

色达：位于炉霍以北，距康定四百四十四公里。藏语称其地为“瓦述色达”(ཁ་བྱུ་ལཱ་ཤེར་ཅན་ 瓦述，是散居在青康交界牧区中藏族十八述氏家族之一部，据说是因为历史上曾在这里发现过一块马形的黄金而得的名称，也有称之为金马草原的)。长期为部落制，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流设达威县，置委员。辛亥革命后，又恢复部落统治。解放后于一九五二年建立色达办事处，一九五五年设县至今。

甘孜：位于炉霍西北部，距康定三百八十三公里。藏语称其地为“甘思”(དགའ་མཚོ་གཙང་)，一说其意为白色而美丽的城；另说是甘孜寺建寺在白色石头的地基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康区建立十三所黄教寺庙的第一所寺庙～甘孜寺时，曾择定吉日，举行开基典礼，因而称当地为甘珍(གྲོ་འཛོམས་)。汉语根据译音，称为甘孜。

据史书记载，甘孜土司制度始于唐贞观(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年间，原因是唐文成公主入聘西藏时，甘孜酋长昂旺(ངག་དབང་)护从迎亲大臣禄东赞(ལལ་དང་དམ་པ་)有功，被唐王封为甘孜土司，后固始汗征服康藏，封其王子七人于甘孜、炉霍等地，称为“霍尔七部”(清末尚存五部)。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赵尔丰在甘孜改土归流，设甘孜委员。民国元年(公元一

九一二年)改甘孜州,二年,复改县至今。

新龙:位于甘孜以南,距康定四百九十五公里。地处雅鲁江两岸,因气候温和,森林茂密,宜于农作物生长,藏语称其地为“拉绒”(ལག་རྩེ་)、“娘绒”(ཉག་རྩེ་)。明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册封当地头人五名为上、中、下瞻对土司。清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藏军曾一度割据瞻对,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退出。因当地民风强悍,又多次发生过变乱,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赵尔丰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曾奏请改称怀柔县。后因县名重复,又改称瞻化,设委员,隶属邓柯府。民国三年改县,一九〇五年新龙解放后,根据当地有“主磨宗”(རྒྱུག་མ་རྩེ་ 其中“主磨”是母龙的意思)、“主沙宗”(རྒྱུག་གསར་རྩེ་ 主沙即新龙的意思)地名的译意,改称新龙县。

德格:位于甘孜以西,距康定五百八十八公里。德格名称的由来,据传,德格土司家族第二十九代的四郎仁青,曾担任过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第一代萨迦法王八思巴·洛追降村(འབྲོ་མགོན་ལམགས་པ་སྔ་མཆོག་ལྷུ་མཚན་)的“色班”(གསལ་དཔལ་ 即膳食堪布,负责掌管法王的饮食),法王称他具有“四德”(指佛教中的法、财、欲、解脱等“四部”)、“十格”(指种地、造屋的善土,筑墙、制磨的善石,行船、止渴的善水,建房、作薪的善木,放牧、饲畜的善草,以上土、石、水、木、草各占二格,合为“十格”)的品质和福分,以后四郎仁青即以德格作为自己家族的族名。地名也随德格家族的名称而称为德格(དེ་རྒྱལ་),清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改流,设德化州,隶属邓柯府。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恢复德格名称,设县至今。

白玉:位于德格以南,距康定六百二十二公里。藏语称其地为“白玉”(དཔལ་ལྷུ་),意为吉祥兴隆之地,历为德格土司所辖。明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册封当地头人降德为千户。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改流设白玉州,隶属巴安府。民国二

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县至今。

石渠：位于德格以北，距康定六百五十九公里。因地处雅砻江上游，藏语称其地为杂曲（རྩ་རྒྱུ）或杂曲卡（རྩ་རྒྱུ་ཀ་），意为杂曲的两岸）也称色须（ཤར་གུལ་），其意是石渠有一座较大的寺庙，系西藏色拉寺喇嘛呷举罗绒邓登所建，称为色须寺。色须寺所在的地方，称为色须。居住在那里的部落，称为色须部落。汉语根据色须藏名的译音，称为石渠，为一游牧地区，历属德格土司管辖。清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改流设县，隶属邓柯府。

此外，一九七八年撤并的邓柯、义敦、乾宁三县，其名称来源和历史沿革分别是：

邓柯：位于德格以北，距康定六百四十一公里。藏名为邓柯（འདན་ཁོག་），意为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下属四大部将之一的邓马（འདན་མ་）出生的地方。历为德格土司和春科、高日、灵葱土司的领地。据记载，邓柯汉时是羌族部落，唐时为吐蕃吞并，元时为朵甘思（མདོ་ཁྲིམས་）营军万户府所在地，明设朵甘（མདོ་ཁྲིམས་）卫。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赵尔丰在邓柯改土归流后，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在此设边北道邓柯府。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府为县。一九七八年撤县，其地界分别并入石渠、德格两县。

义敦：位于理塘、巴塘之间，距康定四百零五公里。藏语称其地为岭呷西（ཤིང་དྭགས་གཤིས་）或岭卡西（ཤིང་ཀ་གཤིས་），据传，这里是藏族古代英雄岭格萨尔王所辖地区，并有格萨尔王的叔父撮通（ཀུའུ་ཁྱེ་བྱུང་）在这里建筑的碉房一座，因而得名。汉语译为冷卡石。历为理塘、巴塘两土司的领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流后，在此设三坝厅，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称义敦，设县。一九七八年撤县，其地界分别并入巴塘、理塘两县。

乾宁：位于康定西北，距康定一百三十八公里，古称噶达（མགར་ཐང་），意为禄东赞（མགར་དམ་པ་ 藏语称噶当巴）在为藏王松赞

干布(ཀུན་བཟང་གཤམ་པོ་)迎娶唐文成公主以后，被作为人质留居长安。后以朝神山为名，到了这里，摆脱了唐王的控制，逃往西藏地方。清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在这里为七世达赖修建的惠远寺落成，改噶达为泰宁(亦称泰凝)，清宣统三年改流以后，归道孚管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改设泰宁实验区，后改为设治局。同时，刘文辉用他“自乾”的名号，改泰宁为乾宁。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设乾宁县。一九七八年撤县后，其地界分别并入道孚、雅江、丹巴三县。

一九八三年四月

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

邓珠拉姆等提供资料 来作中执笔

今年藏历七月十二日（公历为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是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格达活佛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三十周年的忌日。

在我们即将热烈庆祝建州三十周年时，对于曾任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以实际行动支援过红军；在红军离开甘孜后，又甘冒风险，掩护转移红军伤病员，抢救红军伤残战士；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英勇献身的格达活佛，特别表示深切的怀念。

（一）

格达活佛，法名格桑登真·扎巴他耶。一九〇二年生于甘孜县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七岁时被定为甘孜白利喇嘛寺活佛，后即移居甘孜白利喇嘛寺。十七岁去西藏拉萨噶丹寺学经，八年后获格西（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籍考取学位名号）学位，是一个格鲁巴（黄教）教派虔诚的信徒。由于他自幼曾在农民群众中生活，因而他生活俭朴，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常将寺庙所得布施拿出来周济穷人。他又懂藏医，经常为附近贫苦农牧民看病施药，他还编写了大量本民族的锅庄歌词，其中一部份至今尚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传播藏族人民的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剥削、歧视藏族人民，实

行大汉族主义统治的法西斯行径无比愤慨，他所主持的白利喇嘛寺，经常收容有二、三十个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出走的劳动人民，因而藏族人民都非常爱戴他，称他“真正是‘普渡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二)

一九三五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藏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诬蔑，通告群众不准卖粮食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这时格达活佛派人探听了红军的动向，听了红军的宣传，在红军到达甘孜后亲眼看到红军广大指战员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扰害百姓的实际行动，深为叹服，他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因而决心靠近红军，并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群众广为宣传，说服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要各自安居乐业。在他的宣传影响和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消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这时，格达活佛又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响应红军号召，反对国民党官僚军阀和反动土司头人的压迫剥削，组织藏族人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他受到朱德总司令亲切的接见，并积极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筹建工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在甘孜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成立大会，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格达活佛在会上被选为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也讲了话，他号召藏民团结起来搞好生产，支援红军，制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他又派遣自己寺内的喇嘛到各处向群众宣传红军和博巴政府的政策，张贴

宣传告示，打听敌人消息。召回村民生产，动员群众筹备粮食支援红军。仅白利寺就支援红军粮食青稞三万多斤，豌豆四千多斤。对此，红军专门派负责干部向格达活佛表示了深切谢意。

在红军的密切接触中，格达活佛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纲领、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进而受到了更为深刻的鼓舞和教育。

他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红军和中央军反复进行了对比，认识到：国民党的官吏和军队，一到藏区就是压迫剥削歧视打击藏族人民，他们的苛捐杂税和乌拉差役多如牛毛，压得藏族人民喘不过气来；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则是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不住寺庙，不住民房，不派乌拉差役，不打人，不骂人，还把藏族人民当作红军的朋友。对比之下，更加坚定了他永远相信共产党，愿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红军决定北上抗日离开甘孜前夕，格达活佛更加积极为红军筹备粮食、帐篷、皮火筒等物，亲自到附近一些寺庙去商量如何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问题。当红军离开甘孜时，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向格达活佛告别。对他说：我们要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要很好地团结起来，把博巴政府办好。只要团结得好，就能够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红军至多十年、十五年是一定要转来的。朱德总司令的这番话，使格达活佛深受鼓舞，对他以后坚持斗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自己决心铭记朱德总司令的教导，坚持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光明温暖的春天的到来。

红军走后，格达活佛时常怀念共产党和红军，他把红军保护寺庙的布告和文件隐藏起来，并时刻为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而进行祈祷，还继续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坚定地相信并鼓励群众：红军总有重回甘孜的一天，藏族人民也总有翻身解放的一天。这就增强了群众对红军的信赖和希望。

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甘孜喇嘛寺反动喇嘛生龙多吉一

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公开杀害了甘孜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四十多人，还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格达活佛对此极为震惊，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甘孜寺进行劝阻，同时把没有受到伤害的红军重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喇嘛寺居住，并把轻伤病员作了转移。一些重伤病员经过格达活佛一个多月的精心调理治疗，绝大部份的伤病员得到了恢复和好转，先后有二百多名由格达活佛亲自派人安全送出藏区。

格达活佛不仅积极保护红军伤病员，而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屈服。当国民党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动员他和红军切断联系参加国民党时，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后来格达活佛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纠缠和迫害，带着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到西藏拉萨避难。

在拉萨期间，格达活佛对红军仍十分怀念，他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念经祝福，为红军祈祷平安。并经常打听红军的胜利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在拉萨住了十年。

(三)

一九四九年，青海、甘肃两省相继解放，消息传来，格达活佛极为高兴，当即派出代表，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从青海绕道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红军走后藏民遭受的灾难，并代表甘孜地区人民，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敬，希望早日解放康藏。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活佛在甘孜亲自主持召开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他的代表得到苗逢澍政委要他进一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准备迎接解放军，并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指示时，格达活佛积极向当地人民进行了宣传，为大军进藏准备了很多粮食。解放军到达甘孜时，格达活佛以无比激动的

心情，和当年留下的红军以及当地人民群众，亲自跑到十里以外的地方，热烈欢迎当年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到达后，格达活佛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等职。当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要在北京召开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发来电报，请格达活佛去北京开会，这时他多么想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啊！可是当他看到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反动份子一直阻挠西藏当局派代表去北京进行和平谈判时，心里十分气愤。他想：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藏族是中国境内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在伟大祖国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各族人民同样尽了自己的一份光荣的职责。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同样也侵入了西藏地区，他们还进行了各种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西藏各族人民，则和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不断行使民族压迫政策，致使西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少数顽固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离间，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就会使西藏各族人民陷于被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他想到这里，决心不辞辛劳，亲自前往拉萨向西藏政府晓以大义，陈说利害，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贡献。他向甘孜党委、政府和亲友们说：我是十分希望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还没有解决，我必须先到西藏去，向有关人士讲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服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等到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此，地方党委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以及他的亲友，对他去拉萨可能会遇到危险，都表示关心和耽心。但是他说：我相信西藏地方政府会深明大义的，为了祖国的统一团结，为了西藏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⁵一九五〇年七月四日，他谢绝了各方面的劝阻，毅然离开甘孜，前往昌都。临离开甘孜前夕，甘孜及白利寺地方僧众，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对格达

活佛表示欢送，并在沿途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九五〇年藏历七月初五（公历八月五日），在广大僧众的护送下，格达活佛安全到达昌都。

（四）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不怕旅途劳累，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昌都地方当局中个别反动分子、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等人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对此，格达活佛泰然置之，并决心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进行谈判。但因当时昌都电台仍然为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所控制，福特即利用格达活佛去电报局发电的时机，假献殷勤，在茶里放了毒药，向格达活佛下了毒手，格达活佛被害身死。死后因中毒全身乌黑，在昌都进行了火化，这时格达活佛年仅四十八岁。毒害格达活佛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时被俘获，受到了应有的惩治。

格达活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藏族地区，广大藏族人民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西康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布讣告，肯定了格达活佛是藏族人民中最优秀杰出的人物之一，深受广大藏族的爱戴，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的死，是为了祖国统一和广大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死的，是死得其所，虽死犹荣。同时他是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西藏反动分子残害而死的，这就使广大藏族同胞更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个别坚持反动立场分子的罪恶嘴脸，进而更加坚定了藏汉民族亲密团结，誓把帝国主义势力驱出西藏的信心和决心。毛主席还把亲笔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

同一百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格达活佛所主持的白利喇嘛寺，访问团又亲自到了格达活佛的家乡——甘孜白利乡德西底村，对他的亲属进行了亲切的慰问。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奉命向西藏进军，并分数路渡过金沙江。金沙江以东地区的藏族人民，为了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实现祖国的团结和统一，继承了格达活佛的遗愿，积极支援大军解放西藏，自动组织了一万二千多头牦牛运输队，使昌都很快得到解放。这时，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终于派出代表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同中央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格达活佛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经过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现在西藏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都根本结束了人民长期遭受残酷剥削、压榨的境遇，正在朝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奋勇前进。格达活佛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身体力行，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英勇献身的革命事迹深深地刻印在祖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思想里，他不愧是藏族人民宗教界杰出的爱国人士。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祖国人民也永远怀念着他。

一九八〇年七月

为本文提供资料的还有：于在滨、阿都泽呷等同志。

甘孜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 世系及其兴衰经过

松吉邓珠口述 郎加 韦刚翻译搜集 桑作中整理

解放前的康区，由无数大小封建土司、头人割据着，形成独具一格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种封建农奴制社会在康北更具特色，其中，甘孜的孔萨土司，不论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家族。比如，在政治上，它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世袭统治制度，形成甘孜地区的一大势力，并酿成过影响很大的“甘孜事变”；宗教上，解放前在康北地位最高的活佛——香根活佛的两世转世，都出自孔萨土司家族，这就更为加强了孔萨土司政教合一的统治。现将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世系及其兴衰经过，概述于后，供作参考。

一、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

关于甘孜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史书和民间有许多记载和传说。据《甘孜县志》记载，“公元一六〇二年（明崇祯十五年），甘孜白利土司以黑教摧残黄教，旋被青海固始汗派兵灭之，以蒙古霍尔种人分治于此”。“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福康安平息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沿途土司随征有功，诏封霍尔孔萨土司为招讨司，霍尔章古、霍尔白利、霍尔东科、霍尔麻书各土司为安抚长官司，号称‘霍尔五家’”。据《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叙述，明、清之交，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封其王子七人于自治州北部的甘孜等地，

称霍尔七部(清末尚存五部)。又据《打箭炉厅志》记载:“霍尔孔萨安抚司住牧甘孜东界,始祖为苏尔特,其后世拉布丹于清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投诚授职,颁有印信号纸”。

另据传说,公元一六二〇年,元世祖忽必烈(藏族称为色清汗)邀请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第一代萨迦法王八思巴·洛追降村去京城讲经,八思巴在途经甘孜一带时,见当地土地肥沃,地域辽阔,但佛教不盛。到京后,即要求元世祖批准在康北建立寺庙。忽必烈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答应了八思巴的要求,并派自己的儿子霍尔色翁(注)偕同八思巴的弟子呼·阿尼登巴、同到康北修建寺庙,据说在他们将出发时,八思巴亲自送给他们一匹驮运佛具的白骡子,并嘱咐说,这四匹白骡子走到什么地方不走了,就应当在那里修建寺庙。后来,这四匹白骡子走到“正协”(现甘孜)“得”(现甘孜打金滩)地的一口水井前停了下来,于是就在“得”兴建了一座塑有“得棍保”(ཐུ་མཁན་པོ་即护法神,佛书译为怙主、依怙尊)的经堂,以后扩建为寺。藏族称之为“得棍康”。汉族因护法神面部为深蓝色,称之为“黑神寺”。

在兴建寺庙的施工过程中,霍尔色翁与拖坝一女子相通,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霍尔郎加。后霍尔色翁修完寺庙返京时,把妻子和小孩一起托咐给“着给寺”(后来的仲萨寺)的日巴活佛。霍尔郎加在长大成人后,日巴活佛送给他几户“科巴”(差民),成为头人。当时,甘孜地方已有很多部落和头人,如科则的仲呷家、南多的俄绒家、呷拉的呷扎家、城北的相子家等等。由于霍尔郎加勇猛有谋,逐渐征服了这些小的部落。在传到第六代郎卡降泽时,其统治范围已扩大到西至甘孜扎科、东到炉霍、

注:据孔萨益多提供:“霍尔色翁”可能是“霍尔赛王”之变音。因霍尔(ཁོ་རྩ་)是藏语蒙古人之意,赛(སྐར་)是公子之意。又因他是皇帝的儿子,故称之为王。

道孚等大片地区了。

郎卡降泽先后娶了三房妻子，各生有两个儿子。长妻的儿子分别叫翁洛、七斤昂旺彭措；次妻的儿子分别叫翁波、昂旺巴绒；三妻的儿子分别叫翁穷、罗绒丁真。郎卡降泽去世后，三房妻子相处不和，于是分门立户，各由长子担任土司，其中翁洛任麻书土司；翁波任朱倭土司；翁穷任章古土司。并划分辖区，互不求属。由于他们的先祖都是霍尔色翁，因而甘孜、炉霍一带三个土司所辖的地区，统称为“霍尔”。

麻书翁洛传至第三代巴土洛耶时，巴娶了两房妻子，又各生两个儿子，长妻的儿子分别叫大黑洛依、堪布措拥；次妻的儿子分别叫多吉绕登、喇嘛昂翁。巴土洛耶去世后，两房妻子又各立门户，其中大黑洛依承袭了麻书土司的职位，多吉绕登则在麻书官寨的右方新修了一幢房子，藏语称新房为“孔萨”（ཁང་གསར་）。所以多吉绕登即成为孔萨第一代土司。并与麻书土司大体以雅鲁江为界，分辖领地。

二、霍尔郎加及孔萨土司世系

根据民间传说，霍尔郎加的世系是：

霍尔郎加（第一代）——

霍尔阿吉（第二代）——

布格吉（第三代）——

喇嘛肖（第四代）——

郎卡洛绒（第五代）——

郎卡降泽（第六代）——

{ 翁洛（麻书第一代土司）——
昂旺彭措
翁波（朱倭第一代土司）
昂旺巴绒

- | 翁穷(章古第一代土司)
- | 罗绒丁真
- | 洛卡松珠(麻书第二代土司)——
- | 巴士洛耶(麻书第三代土司)——
- | 大黑洛依(麻书第四代土司)
- | 堪布错拥
- | 多吉绕登(孔萨第一代土司)
- | 喇嘛麻翁

多吉绕登在担任第一代孔萨土司后，努力扩展自己的实力，首先建立、健全了头人制度。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到西藏参拜了七世达赖格桑嘉错，自称是达赖的弟子，还邀请了热振活佛昂旺秋登到甘孜讲经，导致他的声望得以与日俱增。

在传至第四代四郎却登时，四郎却登的妻子在分娩时逝世，四郎却登即与属下一个女奴洛朵私通，生有一个男孩。当四郎却登病逝时，小孩还年幼，由甘孜地区的郎扎活佛格绒郎加给以保护和支持，并由郎扎活佛给取名格绒达吉，成人后承袭了土司职位。格绒达吉曾到西藏及尼泊尔等几所大寺院学经。回甘孜后扩建了甘孜寺，以千手观音作为寺中主佛。通过逐年发展，甘孜寺成为了康北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之一。

格绒达吉的妻子志玛拉错生有三个儿子，长子绕洛登比恩珠被选为扎科染拉活佛的转世；次子洛绒降泽曾被选为十二世达赖成烈嘉错的转世灵童，被迎去西藏。后因在金瓶掣签中落选，七世班禅丹比尼马说他是四手观音化身，给他受了沙弥戒，取法名罗绒尺朱，授予了“香根”名号，说他是青海果洛、玉树、康区霍尔地区喇嘛教民的“救星”（香根的汉译为救星）享有了仅低于达赖、班禅的宗教地位。洛绒降泽于清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返回甘孜，成为了康北最大的孔萨家族中第一世香根活佛。三子欧朱彭措承袭了土司职位，由于他的长兄、次兄都在宗教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于是孔萨土司进一步发展了政教

合一的制度，土司制度得以进一步巩固起来。传至德钦翁姆（女）时，共世袭了九代。

孔萨土司的世系是：

多吉绕登（第一代）——

丁 真（第二代）——

降村罗布（第三代）——

四郎却登（第四代）——

格绒达吉（第五代）——

〔绕洛登比恩珠（扎科染拉活佛）

洛绒降泽（第一世孔萨香根活佛）

〔欧朱彭措（第六代）——

拥金堪珠（女、第七代）——

欧朱丹珍吉美（第八代，1887~1924）——

德钦翁姆（女、第九代、1915~）

三、孔萨土司的辖区与赵尔丰的改土归流

孔萨土司的辖区，据《打箭炉厅记》记载：东界一百四十里至炉霍朱倭；西界七十里至白利；南界三百五十里至瓦迷崇喜；北界三百五十里至革责。孔萨土司官寨所在地甘孜，距打箭炉七百三十里。管辖农牧民九百二十三户。自清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受册封颁发给印信、号纸以后，每年向清政府认纳粮赋税银七十两（《甘孜县志》为八十四两四钱）。每遇年班，即进京朝觐。

公元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麻书土司扎西郎吉嗜酒暴虐，被人暗杀，无后。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皇帝批准，由孔

萨第八代土司欧朱丹珍吉美(麻书土司扎西郎吉之婿)兼理其业。至此,原麻书土司所辖的东界二百八十里至扎坝,西界一百一十里至图根纳雍,南界三百五十里至瓦述玉科,北界一百八十里至大地坝等大片土地和居民,也都归孔萨土司管辖。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三、四月,赵尔丰在甘孜实行改土归流,收缴了孔萨、麻书两土司的印信、号纸,任命寇卓(陕西籍)为甘孜委员。在收缴孔萨土司的印信、号纸以前(一九一〇年四月),第七代土司拥金堪珠获悉理塘、巴塘、德格、高日、林葱、春科等土司,都已被收缴印信、号纸、实行改土归流后,即以进藏朝佛为名,携带儿子欧朱丹珍吉美(第八代土司)和第一世孔萨香根洛绒降泽活佛,与三百余头人、喇嘛,连夜出逃,经赵派兵辗转阻截,终被俘获。经申报清廷批准后,赵尔丰于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三月,在孔萨官寨打曲旁边的七歌波登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废除孔萨土司的名号与权力,收缴了孔萨土司收藏的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给的全部印信、号纸、土司官服、财产,革掉了孔萨香根呼图克图称号,把孔萨土司全家移居南多竹衣村(现南多公社第五生产队)居住,责令其私营土地,应全部按例向政府缴粮纳税,原辖土地、民户,由群众推举保正负责管理。在群众大会上,群众公举了甲日头人贡布次仁和夏虾头人降泽为第一任保正。办公地址仍设在孔萨官寨,但处理事务,不得再请示土司决定。各地原有的“邓果”(头人)、“俄巴”(小头人)等,继续留任,改称保正,规定任职年限为一年,其中有“达汗”(一种蒙古官职名称)职位者,也不予免差。其服务对象,应是官府,而不能再是土司。此后不久,拥金堪珠的儿子欧珠丹珍吉美与白利土司的女儿巴登志玛成婚,孔萨全家也就迁去白利居住。

改土归流后的原孔萨、麻书属地,共划为十个乡,两个村,设有五个渡口。他们是:城区乡(异巴卡)、科则乡、雄恩乡

(呷拉)、南多乡、俄绒乡(现南多公社的部分地区)、布许乡(现色西底公社部分地区)、塔麦乡(现色西底公社部分地区)、俄坝顶乡(现色西底公社部分地区)、色西底乡、得热乡(现色西底公社部分地区)和碗(现城南一带)、得(现城东南一带)两村。五个渡口是：南多渡口(约有五、六户)，直贡顶渡口(约有十多户)，目许渡口(约有三、四户)，俄巴顶渡口(约有二、三户)，塔麦渡口(约有四、五户)。这些渡口的船户，多是因无法完纳差税，才以划船为生。这样，差役虽可全免，但地位低下，生命没有保障。所以，藏民一般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愿充任船户的。

四、孔萨土司的复位与“锡格聂巴”机构的建立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胜利，赵尔丰在康区推行的改土归流，也随之瓦解，被取消了名号的土司纷纷复辟。原孔萨、白利土司，这时也都提出复位要求。当时处于毫无依靠的地方政府，只得准其所求，封给了孔萨第七代土司耿朱丹珍吉美以总保职务，允许迁回孔萨官寨居住，于是孔萨土司又逐渐恢复了过去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官府原经群众选出的保正，也摇身一变，又成了孔萨土司家的头人。

孔萨土司复位不久，为了扩充和发展其经济力量，新建了一个叫做“锡格聂巴”(སྤྲེལ་གྱི་པ་)的机构。这个机构，从字意上理解，是孔萨辖区来往行人的管理者，实际上是一所“税务局”，设立在雅鲁江大渡口的打金滩处，负责收取来往客商的钱税。规定每一百驮茶叶抽税二十元，并在渡口修建了仓库，负责堆存收交和转运过江的物资。

“锡格聂巴”的人选，是在所辖的十个乡里，推举三名家庭

富裕，有办事能力的差民轮流担任，任期二年。“锡格聂巴”筹建后，由孔萨土司和村民筹措基金粮食二〇〇斗，白银六、七平，放债生息。规定粮食利息的三分之一、白银利息的四分之一，作为逐年增补基金。其余利息，连同当年税收和差民支差所收的脚费（差民支乌拉所收的差徭脚费，交付保正，按月累计，上交“锡格聂巴”），全数用于“锡格聂巴”当年开支。如上项收入不敷，“锡格聂巴”就要以自己的家财抵偿；收入超过开支的多余部份，可以增作基金，也可以由聂巴自分。

“锡格聂巴”增加的收入，名义上是孔萨辖区人民的集体财富，拟作为集体活动开支。但实际上，这部份收入一是要负担在孔萨官寨中值班的保正、邓果、俄巴们的生活及费用；二是要负担每年甘孜寺举行大法会时孔萨土司所要承担的部份宗教费用，广大群众是根本享受不到的。

五、孔萨土司的统治机构和差役制度

孔萨土司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土司是最高职称，下面分别设置“结冲”（རྒྱུ་མཆོ་）、“邓果”（དུང་རྒྱུ་）、“俄巴”（འཁོ་བ་）三级。

“结冲”是大头人的称号，其权力较大，“科巴”（差民）也多。改土归流以前，孔萨家的结冲有：异巴卡的相子结冲，科则的仲呷结冲，呷拉的亚隆结冲，异昂结冲，布许的西洛结冲、洛巴下错结冲，南多的俄绒结冲、仲卡结冲，塔麦的加日结冲，色西底的弄冲结冲、德拉结冲、夏夏得结冲等十二家。在上述结冲中，有的在新龙土司贡布郎加占领甘孜时，曾随同孔萨土司一起逃去西藏，住过六年。在藏军战败贡布郎加后，又随同土司返回甘孜，因而被授予“达汗”名号，可以有自己的领地和百姓，并不承担一切乌拉差役，地位高于一般结冲。受封为结冲的家族，可以世代相袭。结冲中每年要有二人在土司官寨中轮流值勤，负责调解官司和处理日常事务，一年一换。在执勤期间，没有“达汗”称

号的结冲，也可以免差。

“邓果”是中等头人的称号，科巴和特权都少于结冲。改土归流前孔萨土司下属的邓果有：俄坝顶亚达、麻达、钦达；布许的亚呷、夺棚、布许、洛巴达错；色西底的德热拉城；呷拉的白马色龙；得的各洛登真；南多的锡安、泽郎加、咋依、咱拉、其绒；科则的虾许；异巴卡的异乌、阿比、色洛、大吉、色得等二十一家。

邓果中每月要有三至四人轮流在土司官寨中值勤，其任务主要是管理土司一家的日常生活问题，如接待客人，给土司倒茶、穿衣、梳头以及负责土司官寨的环境卫生等等。邓果在土司官寨值勤的一个月中，其家庭可以免除一切乌拉差役。

“俄巴”是基层小头人的称号，由群众推举精干得力的人经取得土司同意后担任。在孔萨土司属下有几十个俄巴。俄巴的任务是：协助结冲和邓果工作，如到各村寨催租收债，派遣乌拉差役等。俄巴没有领地和科巴，但本人家庭可以全部免除乌拉差役。

以上的结冲、邓果、俄巴三级，互不相属，由土司直接领导。为了巩固土司的统治，孔萨家还设有两所监狱，并定有挖眼珠、抽足筋、鞭笞、罚款等各种法规，用以维护其家族的利益。例如：处理凶杀案件，杀害头人与平民，都应赔偿命价，其中头人一人被杀，赔偿命价为白银十六平，平民一人被杀，赔偿命价为白银二平。处理偷盗案件：偷头人一头牛，赔偿十头，偷平民一头牛，赔偿三头。头人据此有权处理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调解相互间发生的纠纷，但所得罚款和额外收入，要向土司贡奉一定数额。

此外，孔萨土司还有内部的管理机构。如土司家的财产，由“格隆”（管家）总管。格隆一般由甘孜寺的喇嘛担任，这是因为寺庙拥有庞大的财力和特权，喇嘛担任格隆，对孔萨家的财政收支，能给予较大的支持和援助。格隆下面设有“拖本”，主要经营土司每年私营土地的耕种、收割、入仓等事项。格隆和拖本的

任免，由土司自作安排，大部是终身制。

差民为孔萨土司要服的差役主要有以下三种：

- 1、牛差：主要是承担土司自营土地的秋翻与春耕；
- 2、马差：主要是承担土司自营地的碎土、薅草、收割、脱粒、入仓等农事活动；
- 3、人差：主要是为土司自营地积肥、施肥、为土司家砍柴、背柴等等。

服以上三种差的差民，大部份是固定的，并且服牛差的一般不服马差，人差却要经常协助马差分担部份农活。以上服役者，都要自备口粮，每户每年平均要为土司服差役一百天左右。再加上需要为地方官吏支应的差役在内，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六、孔萨土司与寺庙的关系

孔萨土司辖有四所寺庙，他们是：

寺名	地址	教别	住寺僧众
甘孜寺(དགའ་མཚོ་ཆོས་ལུང་ཆོས་ཀྱི་ལུང་།)	县城	黄教	3000余人
崩果寺(བུང་རྒྱལ་ཆོས་ལུང་།)	色西底	花教	40多人
夺拖寺(རྩ་ཐོག་ཆོས་ལུང་།)	色西底	花教	200多人
色更寺(ཤིང་མཚོ་ཆོས་ལུང་།)	色西底	觉母(尼姑)	

另有八幢“拉绒”(ལྷ་ཁྱེད་ལྷ་ཁྱེད་)活佛的家庙)。分别是：仲萨拉绒、郎扎拉绒、热交拉绒、香根拉绒、夺拖拉绒、扎呷拉绒、崩果拉绒、拉冲拉绒。

在以上寺庙中，以甘孜寺规模最大，在康北地区有着较大影响。该寺僧位最高的是香根活佛，传袭两世，都出自孔萨家族，为巩固孔萨土司家族后期的地位，起到了较大作用。

甘孜寺有“扎仓”(གྲྭ་ཆོས་ལུང་)二幢，即村尼扎仓(修显宗的经院)、昂巴扎仓(修密宗的经院)。寺内的“更操”(执事)，由孔萨土司、麻书土司各指定二人担任。后麻书土司绝嗣，就全由孔萨

土司指定。

每年藏历一月，甘孜寺要在得槐康举行一次大祈祷法会。法会期间寺庙每天发放收受布施，要从中提出百分之二十一，送归孔萨土司。孔萨土司也要在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给全寺大小喇嘛、扎巴各赠送大圆饼一个（重约市称一斤），表示在藏历新年期间，对他们进行慰问。

孔萨土司与官府或其它土司、头人发生纠纷时，也多由寺庙出面调解。发生武装冲突时，寺庙又往往是孔萨土司的武装骨干力量，如一九三九年“甘孜事变”（班禅行辕伙同孔萨土司与廿四军的对抗活动）中，甘孜寺喇嘛曾组织敢死队，为班禅和孔萨土司冲锋陷阵，起到了维护孔萨土司利益的作用。

原麻书土司也辖有四所寺庙和七幢拉绒。这四所寺庙是：

寺名	地址	教别	住寺人数
孔马寺(ཁང་དཔལ་)	斯俄	黄教	260人
折松寺(ཅེ་གཤུག་)	拖坝	黄教	200人
卡龙寺(ཁལ་ལང་)	庭卡	花教	100人
尼更寺(ཉིག་པོ་)	拖坝	觉母(尼姑)	

七幢拉绒分别是：孔马拉绒、异勒拉绒、绒擦拉绒、出隆拉绒、崩隆拉绒、那给拉绒、卡隆拉绒。

在麻书土司绝嗣以后，上列四所寺庙和七幢拉绒，也统归孔萨土司管辖。

七、孔萨家族内部和与其它 土、头之间的纷争械斗

根据极不完全的资料和传说，孔萨家族内部和其它土司、头人之间，曾发生过以下一些较大的纷争和械斗事件：

第五代孔萨土司格绒达吉执政时，因与白利土司争夺旦勒山顶上一块草场，发生过一次武装冲突。后经寺庙喇嘛出面调解，

双方在山頂上堆起了一个白石包作为分界线，械斗始告解决。

第七代孔萨土司拥金堪珠由于与丈夫阿都泽旺彭措相处不睦，意见分歧，拥金为回避家庭的烦恼，以转经为名，离开官寨，到雅鲁江以西的夺拖寺住了几个月。在此期间，所属头人分裂成为了拥护拥金与拥护阿都的两派，这就促使矛盾由夫妻不和，激化为权力之争，并因而发生了一场拼杀。当时多数头人拥护阿都泽旺彭措，住在孔萨官寨。一天，亲拥金的仲呷大头人和牙龙头人等回甘孜串亲，在孔萨官寨附近，被亲阿都的部份头人杀死，还过江枪杀了亲拥的部份群众，激怒了拥金堪珠。于是，她动员了全部力量，包围了阿都泽旺彭措等人所住的孔萨官寨，攻击十分激烈。阿都泽旺彭措不支，突围逃走。拥金夺回官寨后，严惩了反对她的部份头人，重掌了土司大权。后经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新龙的办事处出面调解，促使拥金堪珠同阿都泽旺彭措脱离了夫妻关系。决定土司职位由拥金前夫的儿子欧朱丹珍吉美继任，责成阿都泽旺彭措赔偿拥金堪珠部份损失，这次械斗才宣告平息。

第八代孔萨土司欧朱丹珍吉美因儿子早死而忧伤致死后，其母拥金堪珠再度出任土司。因丹珍吉美的妻子巴登志玛和管家四郎彭措私通，生下一个男孩，拥金堪珠不承认这个小孩（白利翁堆）是孔萨家族的后代，并把巴登志玛赶回白利老家，又几乎酿成一场械斗。后经甘孜寺的大喇嘛香根和大金寺的大喇嘛解色得甲及双方主要头人阿都、普色甲本、阿波等出面调解，以四郎彭措赔偿孔萨土司五十并银子（一并银子折合藏洋一百六十元），由欧朱丹珍吉美与巴登志玛的女儿德钦翁母继任土司，这场纠纷始告结束。

在德钦翁母担任孔萨土司职位期间，曾招赘德格土司的下属大头人结穷泽刀为婿。当结穷泽刀发现德钦翁母另有外遇时，就自行回德格去了。后经驻军团长张行判决二人离婚，由德钦翁母赔偿结穷泽刀部份财物，事态才没有扩大。

一九三九年德钦翁母与班禅行辕联合发起“甘孜事变”，失败后，率领部份头人逃去青海（详见《甘孜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

八、孔萨土司的衰亡

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对孔萨土司的政治、经济是一次沉重打击。据《甘孜县志》记载，孔萨土司在出逃时，组织骑驮七百余匹，经沿途阻截，在石渠菊母夜逃时，遗留行李十余驮，人众五十余；在从甘孜大塘坝逃果洛途中，被缴获财物五十五驮，骡马一百二十余匹；到所逃人众全部被俘获时，财产已损失殆尽，权势也被剥夺。后虽又复其位，并采取多种措施，向群众搜刮盘剥，但其实力，显然已不如从前强大了。

一九三〇年六月，藏军第二次进入康区。驻防德格的藏军，借口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之间的纠纷，向驻防甘孜的川军进攻，由于川康军阀内讧，藏军占据了甘孜、瞻化等地。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藏军又向青海玉树进攻，被青海马家部队战败，青海部队占领了藏军所占之石渠、邓柯等县城。刘文辉这时也派出一个旅的兵力，配合青海部队向甘孜、瞻化进攻，收复了甘孜、瞻化、德格等县城，藏军退至金沙江以西，川藏两军隔江对峙。刘文辉驻军甘孜，设置官府，孔萨土司再度受到二十四军的控制。

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甘孜事变后，孔萨家产又受到一次大的洗劫，地产也收归政府管理。此后，经过德钦翁母的舅父巴波切则活佛，借为祈祷抗战胜利念经的机会，向蒋介石求情，使德钦翁母在1944又回到甘孜，但此时此地，孔萨土司已是一蹶不振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从“大白事件”到“岗拖协议”

桑作中 韦刚搜集整理

甘孜“大白事件”，是指甘孜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于一九三〇年爆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次事件先限于局部地区，以后扩展蔓延到国民党驻康部队与大金寺的战斗；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藏军发动第二次东进；以及藏军与康军刘文辉部、青海马步芳部的战斗等；经历两年多时间，最后以藏军失败、大金寺焚毁、康区人民蒙受了较大的苦难，藏康双方签订“岗拖协议”，藏青双方签订停战和约而宣告结束。现将这次事件的起因、发展以及签订“岗拖协议”等简况，概述如下：

一、“大白事件”的起因

“大白事件”的起因，主要是甘孜白利土司有一所亚拉寺（属花教）家庙，在它第一世活佛贡呷登比降泽（白玉昌台人）住持期间，白利土司曾交予部份土地和差民，并立有字契，表示对活佛的虔敬。贡呷登比降泽逝世后，其转世确拥贡呷曲吉降泽出生于大金寺属下的桑都大头人家里，确拥成人后，遂将以前白利老土司划交的十五户差民送予大金寺。白利土司因和大金寺有隙（起因是一九一七年藏军第一次东进甘孜时，曾得到大金寺

的帮助，以后大金寺常借藏军的势力，在白利土司管辖地区制造事端，以致引起双方的矛盾和对立），提出要收回当年交予贡呷登比降泽的字契。遭到确拥活佛的拒绝，白利土司又以复制留用为名，向确拥活佛借取。在白利土司借得这一字契后，意图拖延不还，引起确拥活佛和亚拉寺僧人的不满。他们趁白利寺群则活佛（是白利土司的儿子，当时被选为德格八邦寺转世活佛）的贴身侍卫背水之机，绑架其作为人质。同时，向甘孜县政府控诉，请求白利土司归还字契，又向大金寺求援，预防不测。

甘孜县政府得悉上项事件后，由县长韩又琦出面，前往调处。一方面要求亚拉寺即刻放人，再方面责成白利土司归还字契，防止事态扩大。双方表面上都按县长的要求，归还了字契，释放了人质，但思想上成见更深。事后，白利土司暗中收买亚拉寺的喇嘛、扎巴，反对确拥贡呷曲吉降泽，确拥则把那张字契以及家庙、地产等，全部献交给大金寺，要大金寺持契代行他的权力，使矛盾发展得更为尖锐起来。

是时，恰遇白利土司丢失了一匹好马，怀疑被大金寺属下的一个差民牵走。白利土司派人前去查访，遭到大金寺的阻拦和驱逐。白利土司盛怒之下，也把大金寺一个同自己女儿相好的喇嘛驱逐出境。这个喇嘛效秦庭之哭，回大金寺大诉其所受之辱，引起大金寺广大僧众的气愤，于是在管家桑领德甲、真真的率领下，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八日黎明，突袭白利地界，并大肆焚掠。白利土司不支，逃去东谷，其下属头人阿布、甲伯和部份百姓，也先后逃去甘孜。白利土司的辖地，全被大金寺占领。

白利土司及其随逃人员到甘孜后，纷纷央请甘孜县政府主持公道，代为夺回领地，当时，甘孜驻军是伪二十四军边防旅的一个营，旅长马骥常驻于此。经甘孜县长韩又琦和马骥商定，派驻军营长罗海宽率部赴白利武力调处。大金寺僧众一方面答应愿意赔偿白利土司所受的损失，认领官府判定的罚金白银二百秤（每秤为白银五十两），一方面又派人到德格请求藏军代本德墨色给予

支援。德墨色除答应全力支援外，还交予步枪三百支，使大金寺感到有了后盾，态度也强硬起来。

马骝和韩又琦在派出罗海宽营前往武力调解时，初先也顾虑藏方干预，把事态扩大，曾写信向德墨色探询。德墨色当时表示：大金寺处于汉界，藏军不拟过问。马骝在得到德墨色的答复后，对大金寺的处理，提出了六款：1. 缴出所有枪械；2. 拆去大金寺的围墙；3. 罚白银四十万两；4. 负责赔偿白利土司和下属百姓所受的损失；5. 交出肇事的祸首；6. 写出今后不再生事的保证。

大金寺对上述条款拒不接受，马骝遂委任部属马成龙团长，担任征甘孜先遣军司令，率兵四营，从康定开赴甘孜，意图以武力迫使大金寺就范。大金寺一方面邀请青海马步芳和藏军驻德格德墨色代本以及甘孜僧商各界从中斡旋，一方面征集武装了全部差民，准备武力抗拒。藏军代本琼让也以调处为名，进驻大金寺一带，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局面。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边防军派出的前沿侦察排长李哲生，在值勤巡逻时，突然被藏军游骑击毙，于是“大白事件”进一步升级，发展到康藏两军的激烈战争。

二、“大白事件”的发展和调处经过

李哲生之死，激起驻康部队官兵的义愤。当即发起攻击，炮轰了亚拉寺和大金寺的防御工事。大金寺也组织本寺武装并联合琼让代本带领的藏军，包围了二十四军连长章镇中设在白沙沟顶的指挥所。经过几天激战，康军指挥所人员，除章镇中一人在翻译员的掩护下，得以生还外，其余全部战死。不久，康军又组织兵力，向生康一带反攻，藏军和大金寺不支，开始溃逃。康军收复了白利失地，进逼至汤古、维堆一带，包围了大金寺。由于大

金寺地势险要，围墙高厚，康军数次猛攻，都无进展。这时，由达赖出面，电请国民党中央，制止康军的进击。中央一方面电告刘文辉，要他停止进攻，一方面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赴康调处，双方暂时处于对峙状态。

但就在这时，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德墨色代本和克墨代本率藏军到甘孜支援。驻甘孜藏军在得到补充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夜，对康军驻地又突然发动攻击。在藏军的强大攻势下，康军节节败退，藏军趁胜进驻甘孜，康军退到炉霍。藏军分两路，一路沿雅砻江而下，直抵瞻化，国民党瞻化县长张次培，聚众固守县城五个月后，城陷被俘，张次培及其属员、眷属等三十余人，被解赴昌都。藏军还趁胜占据了理塘的穹坝、霞坝两乡。另一路藏军进逼炉霍，途经朱倭，因朱倭土司与炉霍县政府官员不睦，献地投城，得到藏军支持，但在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受到炉霍军民的坚决抵抗，甘孜等地的上层、百姓，也不支持，以致形成藏军在炉霍朱倭与瞻化一线与康军对峙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四月，唐柯三离京赴康。国民党政府同时通过达赖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致电达赖，请其命令藏军停止东进，派员商讨解决办法。五月，达赖复电称已令藏军停止军事行动，静候中央派员和平解决。六月十一日，唐柯三到了康定，接获国民党政府电告，达赖已派琼让代本为代表在甘孜等候谈判。唐柯三于七月八日到了炉霍，先派刘赞廷（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去甘孜同藏军接洽。藏军当时自以为胜利在握，对谈判毫无诚意，对唐柯三也十分轻慢。先是琼让来信声称，他只负责招待，并无奉行谈判的任务。后来接得西藏派驻昌都总管噶伦敏堆巴的来信，称他“奉命办理康案”。在唐柯三去信催敏堆巴速到甘孜谈判时，敏堆巴又说已交卸工作，正在办移交待手续，不能前来，以后达赖又委任贡布阿丕为昌都总管，贡布阿丕提出要唐柯三去昌都谈判，遭到唐的拒绝。唐指出：藏军必须退回到原来的防地，才便于调处。但在这时，日寇已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

内形势较为紧张，藏方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达赖曾给国民党中央去电，胡说什么：“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唐特派员建议撤兵，殊属非是。”等等，使谈判拖延下来。直到一九三二年春，达赖才又命琼让代本与唐柯三进行谈判。国民党中央也在这时电告唐柯三：“国难方殷，对藏亟宜亲善，甘事宜从速和解”。唐于是又派刘赞廷与琼让谈判，于十一月六日，拟订了八条协约：

1. 甘孜、瞻化暂由藏军驻守，以后另案处理；
2. 藏军进驻理塘的穹坝、霞坝归还理塘，占领的朱倭退还炉霍；
3. 炉霍、道孚各驻藏军二百人，甘孜、瞻化各驻藏军二百人，其余退出，不得互相侵犯；
4. 被俘官兵一律遣返，由川府拨藏洋二万元付藏军作为补偿；
5. “大白事件”由琼让代本秉公处理；
6. 大金寺所欠康定商业集团的商款，由琼让代本责令该寺迅速归还；
7. 恢复交通，保护商业；
8. 马骑旅长与琼让代本，应互派委员，敬致谢意。

这个草约传出后，引起当地群众和西康各界的不满，特别是白利百姓，更是痛哭失声。由白利土司率领百姓，群赴炉霍向特派员和政府请愿，刘文辉对此也亟表反对，曾复电称：“此案至要，全在藏军退出甘瞻，乃有交涉可言。承示各条……鄙意均期期以为不可。事关国防，并为中央威信所系，窃谓有详慎考虑之必要。……思维再四，未敢苟同”。而藏方也不愿退还穹、霞和朱倭三地，诬说国民党中央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云南中甸就任滇康宣慰使职时，曾声称：“有调解边区各县纠纷之权”，现两个都是全权代表，不知应以谁为是，延缓签字。延至十二月，石青阳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电知唐柯三：“如该约尚未签

字，即予延变”。于是唐柯三返京，“大白事件”交刘文辉全权处理。甘孜八条协议，也自行作废。

三、英帝积极支持藏军发动战争

在“大白事件”发生后，英帝国主义积极支持藏军发动进攻西康的战争，曾供给藏军部份军火，所用战具，也大部为印度孟买兵工厂制造，并有英人担任前线指挥。对此，国民党驻英大使曾向英外交部提出质问。英外交部答复：供给西藏军械，是根据一九二一年印藏条约规定；如中国政府同意，英政府愿意从中调解。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

与此同时，（一九三一年八月）英帝又派驻哲孟雄（锡金）行政官噶乃木魏阿尔到了拉萨，策动藏军向青海玉树进攻。噶乃木魏阿尔与达赖会谈之后，达赖即宣布委派仲译钦冒（秘书长）欧细娃图丹前往玉树方面，主持军政大计。仲译钦冒奉命后，连夜出发，不久，又发生了藏军入据青海的战争。

四、康青两军反击藏军的行动

刘文辉接办“大白事件”后，积极准备武装反攻。这时旅长马骏已为部下所杀，刘文辉复委派余松林旅长率部入康，同时节制马骏所部的边防旅和新从建南（现西昌地区）成军调来的黄汉丞旅。又派人与青海马步芳联络，相约六月十八日协同进攻藏军。委派团长邓骧为前敌指挥，率部进入炉霍。

藏军有鉴于更为激烈的战斗已迫在眉睫，意图在康军还未部署就绪之前，先发制人，挫康军锐气。于四月二十七日，向刚进入炉霍的邓骧团发起攻击，双方在炉霍县城激战数日，藏军不支，仓惶溃退，邓团乘胜追击。刘文辉所派进取新龙的张行团，

不久，也攻克新龙。两路大军齐头向甘孜反攻。藏军防守甘孜的部队，大部是临时征雇甘孜孔萨、麻书两土司的百姓，在邓、张两团进逼甘孜时，在郎渣活佛的策动下，全线反戈，这就促使藏军全线崩溃，黄旅和邓团进驻甘孜。藏军退至俄日村、阿娘诺山一带，修筑工事，图谋防守。

六月十八日，青海马步芳部也派马良臣旅在玉树与藏军厦苏代本所部发生激战，藏军扎西如本（相当连长）那拉和米厥如本沙达拉巴等两名主要军官和大量藏军被俘，青军乘胜追击，将藏军逼至昌都、类乌齐一带。七月二十三日，黄汉丞旅及邓、马、张等五个团，向藏军全线发起进攻，藏军不支，全线崩溃，败逃去德格。大金寺的首领甲伯得哈和敢死队长察然甲登其等分别在白沙沟山顶和俄绒山顶被击毙，希色得呷在白沙沟被俘后跳楼自杀。在围攻大金寺的战斗中，因大金寺围墙高厚，久攻不下，营长罗海宽和连长陈一江翻墙入院，打开大门。固守大金寺的部份喇嘛，仓惶放火，烧了寺庙，竞相逃窜。康军入寺后，趁火抢劫，把寺内许多金银佛像、器皿等贵重财物，囊洗一空，不少官兵大发横财。并在抢劫以后，再次放火焚毁了大金寺。这时进入青海的藏军，已完全被驱逐出境，康军乘胜攻下了邓柯、石渠、德格、白玉四县，藏军溃逃到金沙江以西。

藏军溃败后，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请求英帝驻拉萨的代表韦尔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进行干涉，一方面又派秘书长俄喜图登前往昌都，协助噶伦阿丕开展工作。由于藏军的惨败，驻昌都的噶伦阿丕忧愤致死，接替他的是考察德通。噶到任后，面对崩溃的局面，只好与俄喜图登商议，向康青两军求和，听候谈判。康青两军正欲借取得胜利的机会，打到金沙江以西，夺取昌都之际，突遇川军刘湘的二十一军，联合田頌尧的二十九军，袭击刘文辉二十四军驻荣县、威远一线的防地，刘文辉陷于东西两线同时接战的不利局面。于是立即命令邓瓛等部尽快结束与藏军的对抗，回川参加同刘湘、田頌尧的战争。这样，邓瓛答应与藏军

签订和约。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以邓骥为康军一方，璋让为藏军一方，在金沙江以西的“岗拖”地方签定了“岗拖协议”。

五、“岗拖协议的具体内容”

“岗拖协议”，又称“汉藏暂订停战条件”，共有六条，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双方接受和议，弃仇言好，所有藏汉历年悬案，听候中央与达赖解决。

第二条：汉军以金沙江上下游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金沙江上下游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逾越前进一步，

第三条：自夏历十月八日，即藏历八月初九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即藏历八月二十九日，双方作战部队分头撤退。汉军退至俄支、德格、白玉以东，藏军退至噶登、同普、武城境内，双方每地驻军不得超过二百名，双方各自派员监视撤兵，

第四条：自停战日起，双方交通恢复原状，商民往来无限，只须双方发给护照为凭。对于康藏来往的喇嘛，双方均一律给予保护，

第五条：条文自签字之日起，各飞报双方政府存案，共同遵守，

第六条：此条文适用于藏汉双方，如有未尽，将来由中央同达赖喇嘛修正之。

与此同时，藏军代本索康苏巴、孜仲多吉于介也与青海马步芳的代表马松奇、李正模等，在襄谦德扎宫签订了停战协约，规定双方退回各自原来的地界，并互换战俘。条约规定：“以后如藏方违约，类乌齐、昌都、察瓦八等地均归由西宁管辖，青军违约，也以德木齐等二十五个地方作为赔偿”。这样，青藏冲突也

告结束。

至此，由“大白事件”引起的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告一段落，全部宣告结束。

一九八三年六月

川康二旅“康定兵变”纪实

兰文品

一九二八年，四川军阀、原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派遣他的部属川康二旅旅长马骏（回族，内江观音滩人）进驻康定，并特许马在康定建立“造币厂”，自铸藏洋，充作军饷。

马骏为人贪残暴戾，刚愎自用，常大肆扣发官兵薪饷，在成都、内江一带广置田产。官兵对马深为不满，但封建制度如此，下属官兵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一九三〇年六月，甘孜大金寺和白利土司因产权纠纷爆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事件。马旅奉命进驻甘孜，仅留两连人驻守康定。这时，恰遇驻金川、丹巴交界的另一军阀、原二十八军邓锡侯部下一个排长任辅成携带十数人枪投奔马骏，马骏委之以一空街连长，其余人枪被编入连队当兵。

任辅成是时约二十二、三岁，年轻亡命，提劲打把，爱以“拈香拜把”等手段，广结马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己充任“大哥”。

是年冬，马骏的老婆由康去蓉，夜宿瓦斯沟。任辅成带了几个“兄弟伙”，以“护送太太”为名，向马妻强行“借钱”，马妻在付给银洋二、三十元后，又连夜派人返康向马骏报告。马骏认为是“拦路要挟”，罪在不赦，即电令泸定县驻军把任辅成捉拿关押至康定监狱，并扬言要处以极刑。任的“把兄弟”对此极为不满，商量要劫狱救任。

任辅成在狱中也暗地联络同伙，密谋先行劫狱，再抢造币厂，以示对马骥的报复。但任的“兄弟伙”又大都慑于康定还有邓骥所部一团驻扎，不敢冒然行动，事情暂时被搁置起来。

临近春节，长期没有发过薪饷的马部官兵，都指望在年节之前可得到一笔收入。孰料是年除夕，马骥不顾狂风大雪，把浑身冷得发抖打颤的士兵，集合在旅部（现康定东大街小学所在地）院坝，以“前方士兵现在还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为词，对士兵进行训话，还说：“听说你们中有人要阔过年，我警告你们，有敢阔过年者，杀头！”会后，发给每人半个藏洋（折合二角银元），作为薪饷。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康定旧俗，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允许兵弁沿街摆赌。马骥这天派出了巡查队四出抓赌，使得部份士兵怒不可遏，其中有任辅成的“兄弟伙”刘老么（中士，佚名），乘机煽动，得到马部士兵的大部响应，并很快地串通了起来。

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晚十时左右，当“巡查队”走到下桥僻静处（现康定中医院附近）时，巡查官杨某身后手持出鞘马刀（当时制度，巡查官身后有两名持出鞘马刀的士兵）的一个兵大喊：“报告排长，旅长克扣兵饷，我们要去找他算账，请你参加”！杨欲拔手枪，被那个兵一刀砍翻，又连砍数刀，结果了性命。一队人便直奔县府大监，毫不费力地接出了任辅成，然后飞扑旅部。

驻守旅部的士兵，已早作好准备。会合后立即对旅部和旅部隔壁的造币厂动手抢劫。将造币厂内堆积的银砖、已成和未成的藏洋抢掠一空，旋即又向马骥公馆（当时的曲里巴巴锅庄，现州公安处宿舍）发起攻击，奈因锅庄门坚墙高，一时未能攻下。有人提出，南京政府派有负责调解“大白事件”的专使唐柯三（伪蒙藏委员会委员，与马骥同为回族），现住跑马山麓陈启图（伪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馆（当时的控达娃锅庄，现养路总段

地址)，马骥每晚要前去奉陪，可能还在那里。于是一窝蜂地冲向了陈公馆，恰遇大门尚未关闭，哗变士兵迅速冲进院内。

当晚马骥只带随从弁兵海文凯（回族，马骥的同乡）在陈公馆奉陪专使，对士兵哗变毫无所知。哗变士兵在冲进陈公馆以后，先是在楼下呼喊：“报告旅长，有人闹事”。马令海下楼询问，士兵说明原委，邀海入伙。海惶惶登楼，被一枪击中臀部，坠地身死。

唐、陈等听得枪声，拉马骥去后山躲藏，马不听劝阻，走到楼口怒骂：“是那个混蛋要造反”。只听一声枪响，正中马的咽喉，马立时毙命。唐等魂飞，急躲入后山石洞。

哗变士兵又抢掠沿街店铺。由于当天下午曾有不少士兵向店铺赊购“麻窝子”草鞋，市民百姓察知有变，早已有所准备，各店铺原建有“土库”（商家富户用砖石砌成的库房），一听砸门，店员即带值钱财物，躲至“土库”之内，故损失一般不大，也没有什么死伤。

邓团驻守河西“明正衙门”（现州招待所）内，同马无隶属关系，平时马没有给予邓什么好处。在事变发生后，邓未前往救援，只是派兵加强了过河各桥的岗哨，以致河西各富商殷户，在士兵抢掠中，得以幸免。

哗变士兵在河东大肆抢劫后，即作鸟兽散，一部出东门向鱼通、孔玉逃窜，一部裹胁驻在北门暴障庙（现为康定县防疫站地址）内、刚从天全、芦山“招募”来的两连新兵，逃往丹巴方向。

翌日清晨，夜间躲藏的各级官员，在马骥的胞兄、外号人称“大旅长”马某的率领下，前去请求邓骥派兵追剿，邓以“军心不稳”为借口未予置理，马又派了到康定县的“巡缉队”、“堂勇”、部份袍哥舵把子和少数回民，分头追捕，并下达处死命令，“砍一个人头回来赏藏洋十元”。

逃至孔玉的哗变士兵，被当地土豪、舵把子李海廷收容缴械

后，被脱光衣服，全部从鸡心梁子、大岩窝抛下大渡河。据说开枪打死马骥的刘老么亦死于此。

欲逃丹巴的士兵，到大炮山后被大雪所阻，返回藏匿于中谷、三道桥一带，被追捕者搜出，全部被杀，人头挂满了康定各城门和四桥楼柱。吓得妇女、儿童白天不敢上街。最使人可怜的是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他们本是穷困潦倒、借当兵求生的善良农家子弟，满以为当了兵可以混两顿饱饭，哪知到了康定后，天天挨打受骂，加上天寒衣单，浑身长了冻疮，饱饭也没有吃得一顿。这次被裹胁出逃，完全是懵里懵懂，根本不知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那些爱钱如命的追捕者，对他们也不忍加害。被活捉入城后，竟被一串串地绑到“落魂桥”（现州物资局地址）畔杀头示众，见者无不泪下。

任辅成隐藏于妍妇韩二姐家，被搜出后，在“定海石”（现东关小学对面河边）活祭于马骥灵前。

川康二旅兵变后，刘文辉飞调川康一旅余如海部入康，收拾善后，当然又有部份人被杀或倾家荡产。

民国以来，康定几遭兵变，受害者多是无辜百姓和下层士兵。所以康定人民喜建“土库”，目的是为了避火、避盗、避兵。解放后“土库”已逐渐撤除，仅存的也已成为历史的见证物了。抚昔思今，我们更为珍惜今天。

一九八五年七月

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

白马邓登 夏克泽郎口述 郎加 书刚翻译记录

来作中整理

德格土司，解放前是康区权势较大，统治较久的土司之一。历代土司虽然建立官制，制定法规，以加强巩固政权，然而由于土司集团内部为争权夺位，封建割据，也曾不断发生械斗。特别是在土司统治力量较弱的时候，就往往酿成较为长期、乃至规模较大的动乱，甚至动摇到土司的地位。本文侧重就德格土司在权势逐步衰落的情况下，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较为重大的纷争械斗事件，叙述于后，供作参考。

一、德格土司统治力量的衰落

1. 贡布郎加事变后德格土司权力的衰落

公元一八五二年，第十二代法王（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当时为十一岁）即将接位时。瞻对（现新龙县）头人贡布郎加凭借实力，将康区炉霍、甘孜德格土司的辖区先后占领，切麦打比多吉和他的母亲曲英绒姆，也被拘押到新龙软禁。后虽经下属头人合谋，并请求西藏地方政府出兵救援，击败了贡布郎加，将切麦打比多吉母子接回德格复位，但德格土司从此受制于西藏地方政

府，权势逐步旁落。

特别是曲英绒姆在摄政期间，因与随从巴须扎桑私通，并恣意纵容其干预政事，引起下属头人不满，纷纷交还前世法王（土司）赐予的缎帽和碗套（是法王任命头人时，按例赐予代表权力的两件缎制品），相约出逃。后虽经受过皇帝册封的八邦、²竹庆、雪靖、呷拖、白玉等五所国师庙的主持活佛出面调解，势态稍有缓和，但相互之间，仍互存疑虑。不久，曲英绒姆勾结清政府官兵将所属头人召集到土司官寨内，以部分头人阴谋策反为名，密谋拘押其中为首反对自己的头人。在关锁寨门前，不慎被聂清祝莫布察觉，奋起阻止，被土司随从击毙，其余头人仓惶逃走。事后，寺庙和头人联合武装，包围了政府官兵和土司官寨，断绝了水源。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清军统领被迫与头人妥协，将法王母子送去成都居住。头人等推选成立“仁登会议”（头人代行土司职权的议事机构），轮流代行土司职权。以后，切麦打比多吉及其母亲病死于成都，在寺庙和头人的要求下，将其子曲加多吉生根（阿甲）和昂汪降白仁青（八巴）接回德格。

经过上述两次多年的动乱后，德格土司的统治权势，较前已大为衰落。

2. 阿甲与八巴的争斗

阿甲与八巴返回德格后，围绕土司的职权问题，在兄弟之间以及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阿甲和八巴返回德格后，掌握德格土司“业夏勒空”（由聂清和相子负责处理土司日常事务的办事机构）实权的聂清龚空德钦（江达古色地方的大头人）、结穷降央彭错（德格中麦宿的大头人）等积极支持阿甲继承土司职位。并为之迎娶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盆波地区贵族吉绒错吉的女儿吉绒呷玛曲西、作为阿甲的妻子。阿甲继位后，土司权力实际落在“业夏勒空”手中。阿甲当了几年傀儡，决定去西藏出家为僧。走时，把土司职位和妻子一并转让给弟弟八巴。

八巴当政后，为摆脱“业夏勒空”的羁绊，长期在中麦宿的索莫坡章（德格土司所设的官寨）内理事，并起用了一批边远地方的头人，逐步削弱了囊空德钦和结穷降央彭错的部分实权，引起囊空和结穷的不满。于是，囊空德钦支使结穷降央彭错和邓科阿都大头人次勒郎加等去西藏策动阿甲重返德格执政。并向阿甲挑拨说：八巴是巴须的私生子，不是德格土司家族的正传血统，不应承袭土司职位。提出：为使德格土司家族的权位不为异姓篡夺，愿意组织一支武装，护送阿甲返回德格。阿甲被说服后，先在金沙江以西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并亲自率领，向八巴驻地索莫坡章进逼。

八巴在得知降央彭错等去西藏迎请阿甲重返德格执政的消息后，和囊空德钦之间的矛盾日趋公开。囊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解除八巴的依靠力量，首先设法毒死了八巴的亲信夏克扎西郎加。八巴也选派了昌台头人呷马翁扎、赠科头人穷热布扎等组织群众武装，将囊空德钦包围杀死于麦宿官寨。这时，赠科头人赠伯阿德等，提议应组织力量，阻止阿甲返德，八巴以兄弟不宜自相残杀为理由，未予接受，并准备退让土司职位。

阿甲重返德格继任土司职位后，在降央彭错等人的支持下，首先杀死了支持八巴的沙呷头人革勒（又名沙给），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同时，因怀恨赠伯阿德提议要用武力阻止他们返德，组织武装包围了赠伯家的楼房。由于赠伯阿德组织坚守，一时未能攻破，后经赠伯阿德的儿子，在赠科管管草场的浦巴泽烈、阿革弟兄组织群众，杀散了包围武装，救出全家，逃到了昌台地区。支持八巴的俄玛头人泽西、江卡头人巴珠，见势头不好，也带领家属往石渠方向逃跑。行至卡松渡江边时，因受到堪多头人阻挡，被迫绕道昌都、贡觉，逃往西藏安身。

支持八巴的头人相继逃走后，阿甲又命武装到麦宿把八巴押回德格，被软禁在土司官寨。但很快又被支持他的头人，夏克家的亲信扎西罗布、贡布多吉与更庆寺喇嘛、扎巴等，密谋策

划，潜入官寨，里应外合，营救脱险，逃往石渠方向。阿甲闻讯后，派出骑兵进行追击，在追至竹庆和邓柯之间的娘布老则嘎日山时，和后卫部队扎西罗布展开了激战。因兵力悬殊，扎西罗布等三十余人被杀死，其余被抓回德格。阿甲将其中较有名望的扎楚家泽仁彭错两兄弟杀死，把头悬挂在更庆寺西面的护法神经堂里念咒示众，其余人被鞭笞后释放。八巴及随行人员贡布多吉等数人，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轻骑逃脱，未被追上。

八巴退至石渠后，认为阿甲逼人太甚，在色须（现石渠县西区）发出讨伐阿甲的号令。响应这一号令的，当时虽然只有石渠西部的呷衣部落、察热部落，白玉昌台地区的赠伯阿德和金沙江以西的部分头人，多数头人不愿参与其事，但八巴仍率领拥护自己的数千头人，向德格展开攻击。阿甲遭到八巴和同善地区江卡巴珠的夹击，因势不支，逃往邓柯，八巴占领了德格土司官寨。这时，支持八巴的头人中有的建议，应对阿甲乘胜追击，以绝后患。但八巴认为：土司的官寨、印信，已经到了自己手里，阿甲只是一小部分，没有多大实力，无需再行追逼，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封赏追随头人，整理土司内务，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方面。

3. 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对德格土司的沉重打击

公元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在康北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置流官统治）。阿甲派出自己的亲信龚埏大头人河曲生根、恩通头人贡布多吉，到甘孜求见赵尔丰，表示支持“改土归流”，指控八巴反对“天命皇帝”（藏族对皇帝的敬称），要求赵派兵收复德格。其时，赵尔丰正感到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受到了各地土头、寺庙的反对，阻力很大，并为此十分苦恼。而康北一带的土司制度更为完善，不知从何下手。得到阿甲的请求，感到正可作为进军北路的突破口，于是奏请清廷，敕封阿甲为德格宣抚司，并派遣部队进驻邓柯，前往进攻八巴。在龚埏和八巴部属打了一次小仗，八巴不支，退至

石渠境内，阿甲又回到土司官寨，和赵部一起，控制了德格局势。

一九〇九年四月，赵尔丰和阿甲又联合派遣部属，进剿在石渠的八巴。在石渠西区马米塔多，受到八巴部属的夜袭，赵和阿甲的部下，受到一定损失，阿部头领聂清甲打生根受重伤。赵尔丰闻报后，立即组织反击。八巴失利败退，带领亲信头人赠伯阿德、夏克扎西郎加的妻子泽旺志玛以及石渠头人贡洛、察热头人洛它、贡它等二千余人，溃逃至青海果洛地界。经拉卜楞寺活佛降央异巴（是和八巴母亲私通的巴须扎桑的儿子，据说和八巴有同父异母关系）保荐，投靠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麾下，被暂时安置在海南一带驻扎。

不久，八巴等抓获赵尔丰派去给马步芳送信的囊空头人亲信扎西，搜缴了投递信件。信上说：八巴、夏克、赠伯三家，是清皇叛臣，曾杀死官吏和头人，罪在不赦，了解到这些人现归你部，望能把他们交付处理。八巴等见信后，预感对自己不利，又再次请求降央异巴设法解救。这时，正遇十三世达赖从北京返藏，途经拉卜楞寺，降央异巴即转请达赖把八巴等人带去西藏安置。经达赖同意后，八巴、赠伯、夏克三家，随同达赖到了西藏，被安置在藏北黑河地区。八巴并被授予四品“台吉”（官名），进入了西藏地方政府。不愿去西藏的贡洛、洛它、贡它等人，在青海住了一段时间，于辛亥革命暴发后返回石渠。夏克泽旺志玛和赠伯阿德等到了西藏后，也在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九月，参与了西藏地方政府驱逐驻藏清军的战斗。因表现勇敢，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器重，在一九一八年藏军入据德格时，又重回到了靠近德格地区。

德格土司经过以上六十年的变乱，特别是通过阿甲和八巴之间的内部纷争和赵尔丰的改土归流，统治力量日趋衰落，在所辖的头人内部，更因长期争战、仇杀，形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对立阵营，加上辛亥革命以后民主空气的传播，造成了土司统治集团内

部的分崩离析，加速了土司制度的瓦解。特别是玉龙头人夏克刀登一派实力的不断发展，对德格土司的统治造成了较大的威胁。

二、夏克刀登的家世及其实力的发展

1. 夏克刀登的家世

据传，在德格第十八代土司当泽多吉郎加（公元1818年——1878年）当政期间，德格更庆地方沙呷大头人的侄女阿德玛和土司家一名喂马差民私通，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白马伦朱。阿德玛为此受到家人的鄙视，被赶出家门。阿德玛带上白马伦朱到了雀儿山下日伯头人邓真彭错家当了娃子。因日伯邓真彭错缺嗣，在看到白马伦朱十分聪慧时，即将白马伦朱认为义子，后又把女儿嫁与白马伦朱，由白马伦朱承袭了头人职位。因日伯头人所住地方是一步夹沟的形势，在白马伦朱袭位后，根据地形特点，将自己所盖的庄房称作“夏克”，夏克白马伦朱就成为夏克家族的第一代，即夏克刀登的祖父。

由于白马伦朱勇猛有谋，在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继位后，晋升为“业夏勒空”的聂清。当时正遇新龙的贡布郎加派部属鲁乌马侵扰德格，关押了土司全家。鲁乌马一次见夏克白马伦朱赤手空拳打死了两个新龙士兵，对他十分喜爱，留在身边，作为亲信。不久白马伦朱在得知鲁乌马准备要杀死土司全家的消息时，就表面为鲁乌马出谋划策，要鲁把土司全家押赴新龙，说这样可以使鲁的声名倍增。鲁乌马听信了白马伦朱的建议，把土司全家押解到新龙。白马伦朱又暗中和藏军联系，递送情报，使藏军尽快地到了新龙。在藏军包围了贡布郎加官寨时，白马伦朱又设法救出了土司全家，受到了土司的信任。后来，因白马伦朱不满意曲英绒姆与巴西扎桑私通，多次进行干预，引起曲英绒姆的仇视，被曲英绒姆毒死。

白马伦朱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夏克扎西郎加在白马伦朱死后，继任了聂清职位，在土司家族阿甲和八巴的争斗中，扎西郎加是八巴的主要支持者，受到阿甲及其支持者的忌恨，被和他同任聂清的龚空多吉毒死。夏克扎西郎加有四子三女，儿子分别叫夏克降泽、罗绒齐却、夏克泽郎、夏克刀登，女子叫尼麦、德呷、拥青。夏克扎西郎加被害死后，因子女年幼，头人职务由妻子泽旺志马（据传，泽旺志马精明强干，和甘孜孔萨第七代土司拥金堪朱，新龙上占区千户甲日其麦志玛等三人，被人们称为康区三大女魔）承袭，并由他指挥夏克家族人员，跟随八巴转战石渠一带，最后逃去西藏。

公元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二月，清军从昌都西进入藏，十三世达赖组织藏军在江孜一线抵抗。当时，被安置在黑河地区的八巴、夏克、赠伯三家，曾组织了八十多人的敢死队，由赠伯阿德的儿子赠伯浦巴率领到江孜参加作战，后在拉萨玉脱桥战斗中，赠伯浦巴战死。这时，辛亥革命爆发，在西藏作战的清军，群龙无首，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分裂中国的机会到来，唆使达赖策动掀起反汉战争，清兵大败，达赖组织藏兵趁势向东推进，由于德格兵在同清军作战中，表现勇敢，在藏军中获得了较好的名声，受到达赖的嘉奖。达赖还在拉萨色拉寺附近和后藏央卓雍错湖附近，分别划给夏克、赠伯两家一座“溪卡”（庄园），各拨给十多户“科巴”（专给庄园主服役的差民），进入了西藏地方的贵族阶层。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四月，达赖在英帝支持下，攻陷昌都，达赖应夏克家的请求，给西藏驻昌都的总管噶伦喇嘛写信，要藏军支持恢复夏克家原在德格的权势，免除其一切乌拉差役。夏克家到江达后，因慑于阿甲在位的威胁，没敢贸然过江，就在同普的汪布堆地方临时安了家。夏克刀登和夏克泽郎兄弟二人，又重返西藏，进入拉萨贵族学校学习。其间，夏克泽郎因打架斗殴，被开除辍学，夏克刀登用了三年时间，以优异成绩，毕业离

校。

2. 夏克刀登的发迹

夏克刀登结业于拉萨贵族学校后，以头人的身份返回德格。这时，阿甲已被藏军押送拉萨，德格土司家族全被藏军控制，第二十一代土司泽汪邓登等人，每月只能享有很低的生活费用，就连每年各地大小头人所上的“贡份”，也全归藏军所得。驻德格藏军还对当地的土地、人口、寺庙及喇嘛人数、头人情况等，作了详细的调查，意图更加严密地长期控制德格。夏克刀登返回德格后，和驻德格的藏军代本穷热丁睦，只充当了一名“邓果”（小头人）。这时，担任德格“业夏勒空”的成员，主要有聂清龚空活佛、龚空头人河需伯多、杂日头人杂日聂格、大相子郎色泽卡、小相子俄马四郎泽仁等。以后大相子郎色泽卡在江达贪污受贿，被穷热罢免。俄马四郎泽仁升补任大相子职位。

一九二九年，藏军驻德格代本换任克墨。克墨和夏克刀登原在西藏就很熟悉，他当权后，立即起用了夏克刀登，并派他到石渠、白玉等地，处理了一些紧急事务。由于夏克刀登精明干练，办事果断，得到克墨的信任。这时，又遇聂清龚空活佛因意图毒杀杂日头人降央洛泽、戈沙小头人戈察翁吉事败露，被解送昌都听候西藏驻昌都总管审理，克墨代本即提升夏克刀登担任聂清。夏克刀登任聂清后，为壮大实力，于一九三三年（藏历水鸡年）与德格土司下属管辖一千多户、实力较大的玉隆拉日头人拉日伯格的女儿四郎群措结婚以后，拉日头人的独生子因赛马摔死，他即以拉日家赘婿的身份，完全掌握了玉隆头人的权力。同时，他又撮合杂日头人次召登巴将女儿扎拥嫁给亲戚赠伯头人阿革的儿子拉甲为妻，更加密切了同几个有实力的头人的关系。不久业夏勒空中掌权的杂日头人降央洛泽、康都涅巴等退休，德格土司的实权，又逐渐落入夏克刀登和俄马相子手中。

夏克刀登为拉拢外部势力，还促成亲戚结穷大头人的儿子结穷泽多入赘于甘孜拉萨家，丁古大头人的儿子丁古降呷入赘于甘

孜大头人阿都拉呷家，西莫大头人的儿子绕呷入赘于甘孜麻书家的大头人锡娘家，进而得到甘孜地区土司、头人的支持。

一九三二年七月，青海马步芳先后派遣马训、马骅两个旅，将进入青海境内的藏军驱逐出境，又乘胜追击，深入西康境内百余华里，占领了石渠、邓柯等县城。驻扎西康的刘文辉部属，也乘机派遣一个旅，配合青海部队向甘孜、瞻化方向进攻，收复了甘孜、瞻化、德格等县城。至此，金沙江以东被藏军占领的地区，全被收复，川藏两军隔金沙江相持。十月八日，刘文辉和达赖分别派出交涉专员、交涉委员等，在岗拖举行谈判，签订了“岗拖协议”。不久，刘文辉在建立德格县政府以后，即将大部军队撤离德格。德格土司泽汪邓登在夏克刀登、俄马相子等大头人的扶持下，重新执政。夏克刀登等还为泽汪邓登迎娶了青海玉树昂庆土司的女儿降央伯姆为妻，率部平定了白玉河坡等地头人反对德格土司的变乱，这样，夏克刀登又逐步得到德格土司的信任，实力和声望也得以与日俱增。

3. 夏克刀登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接触

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道孚、炉霍、甘孜一带。德格土司派夏克刀登、俄马相子、聂清洛然降央、大头人直莫土登、德卡却美等，各率一部，奔赴甘孜阻击。夏克刀登所部，主要是由更庆寺喇嘛、扎巴组成的敢死队。在到达甘孜地界后，驻扎在绒巴岔的阿都日浦。俄马相子、洛然降央等，驻扎在革拖地方。在一个晚上，红军即打垮了德格土司派出的全部武装，夏克刀登本人被俘，俄马相子等逃回德格。这时，马步芳又派了一个营进驻德格，德格土司全家逃往金沙江以西的江达。

俄马相子等逃回德格后，驻扎在柯鹿洞。因不知夏克刀登的生死，派出江达地区的小头人乌金泽登去甘孜探访。乌金泽登在绒坝岔见到了红军，在问明情况后，红军护送他到了甘孜，在甘孜锡娘格勒家里见到了夏克刀登。夏克刀登向他们叙述了红军的

民族、宗教和俘虏政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情况，告诉乌金泽登，其它被俘人员也都受到很好的待遇，并都已宽释回家。在此期间，朱德总司令还亲自接见了夏克刀登和乌金泽登，给他们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讲述了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今后的前途等等，送给乌金泽登一支马枪和部份“唐卡”（在布上画成的神佛挂像），要他带信给德格人民，“红军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夏克刀登不久即可返回”。乌金泽登在回到柯鹿洞后，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俄马相子和许多群众。以后夏克刀登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

一九四〇年，马步芳又派遣一个团攻打德格玉隆。夏克刀登据报后，逃到甘孜，马部在抢掠了部分财物后撤走。

不久，德格土司邀请藏军援助，攻击驻德格的马步芳军队，收复了德格土司官寨，全家重返德格。藏军和德格土司的部属，乘胜对马部发起追击，在邓柯龙穷洛地界，和马部进行了一次激战，击毙马部营长一名，马军大败，退回青海。藏军按照“岗拖协议”的规定，也撤回金沙江以西，德格土司重又恢复了在德格一带的统治，夏克刀登随之进一步受到德格土司的信任和重用。

三、夏克刀登和俄马相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夏克刀登担任聂清并受到德格土司的信任、重用之后，实力也不断扩大，引起了俄马相子四郎泽仁、大商人布楚楚、聂清结穷涅巴泽多等人的不满。他们暗地里联络力量，扩张实力，与夏克刀登明争暗斗。这一局面，一九四〇年德格土司泽汪邓登病逝以后，更越演越烈。到一九四六年，已使矛盾激化到箭拔弩张、誓不两立的地步。曾先后发生过以下一些较大的事件：

1. 由措那问题引起的矛盾

诺那原是昌都地区类乌齐昌奇寺的管家，因研究佛学有成，被清帝敕封为呼图克图（圣者之意）。在清军进藏过程中，因资助昌都统领彭日升失败，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关押，后逃去北京。一九三五年初，诺那奉国民党中央之命，组成西康宣慰使公署，在康区一带，联络地方势力，配合阻击红军。曾召集夏克刀登到康定参加宣慰大会，听取他关于康人治康的说教。当时，夏克刀登曾表示愿意接受诺那的领导，以后曾和诺那有频繁的书信往来。

俄马相子在得悉夏克刀登和诺那的关系之后，即同布楚楚等以“业夏勒空”的名义，暗中写信给西藏派驻昌都的总管，告知夏克刀登与诺那联系频繁，说诺那是国民党中央派出的要员，他不仅意在康区，而且一旦控制康区后，还有图谋西藏的野心。那时，你们的死对头诺那，将会使西藏得不到安宁。”同时献计说：夏克刀登的家小还住在江达汪布堆地方，你们要设法控制住他的眷属，再设法把夏克刀登调去金沙江以西，这样，诺那在康区的实力，就会有所削弱……。

俄马相子的信送到昌都时，恰遇昌都总管因事前往拉萨，信落在驻同普代本、代理昌都总管泽果手中。泽果和夏克刀登私交甚好，当即告知住在汪布堆家里的夏克泽郎，要他转知夏克刀登，说他在德格一带的活动，“业夏勒空”已向总管控告，劝他不要再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以免在江西的眷属受到危害。不久泽果又告知夏克泽郎说，前次的控告信已转到总管手中，总管指令我负责监督你们全家，还计划调夏克刀登到“江西”来，以加强控制。

这时，正遇亲夏克刀登家的杂日头人降央洛泽对亲西藏的两个小头人振古扎洛、学乌不满，要求夏克家协同予以清除，由于夏克泽郎对此事未及时处置，杂日头人又向泽果代本指控他们贪污勒索，欺压百姓，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对他们加以惩治。夏克泽郎则认为这是德格内部问题，不应由西藏地方政府经管，经向泽

果交涉，同意将此案交夏克泽郎解决。但此事还没等夏克泽郎进行处理时，降央洛泽即派人杀死了振、学二人。夏克泽郎得悉这一事件后，认为事态将会扩大，即一方面急让降央携带家属、财产向金沙江以东逃遁，一方面派下属头人甲穷曲呷带了五平银子（一平银子合一百六十元藏洋），去向泽果代本说情，请求从轻处理。泽果代本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力的冒犯，不允所请，除立即查封了杂日头人的住宅外，还派出三十七名骑兵，前往追捕凶犯，收缴财产。夏克泽郎这时感到在“江西”已很难存身，于是一方面悄悄把家小迁去江东，一方面组织了几十名骑兵，在途中设伏，杀死了泽果代本派出的大部分追兵，促使夏克家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

这次事件引起夏克刀登对俄马相子等人的仇恨。俄马相子一方也积极组织力量设法对抗。首先进一步加强了向德格土司的靠拢。俄马相子还利用其弟俄马日郎被西藏地方政府任命为同普地区“锡聂”（是沿用德格土司的官制由西藏地方政府授职）的关系，加强了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结穷泽多则要自己的哥哥结穷色多、长子次召登巴、次子结穷呷朵分别去到索莫大头人家、杂日大头人家、康都大头人家入赘，意图通过姻亲关系，扩大自己的实力。

2. 由赠伯拉甲被杀引起的矛盾

一九四〇年元月，德格土司泽汪邓登病逝。夏克刀登、俄马相子等召集德格土司境内、受过皇帝册封的五所国师庙的主持活佛以及大头人（邓果）三十，小头人（舍扎）八十，共一百多人参加了宣誓大会。因嗣子年幼，决定暂由泽汪邓登的妻子降央伯姆执掌土司权力。要求大小头人都要听从降央伯姆的指令，效忠于德格土司。

降央伯姆掌权后，比较信任俄马相子、结穷泽多等人，实权也落到俄马相子等人手中。夏克刀登受排斥后，常住玉隆官寨，和俄马相子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因赠伯拉甲被杀事件，促使双方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步。

接赠伯拉甲是赠伯阿德的第三个儿子，清朝末年，赠伯家和

夏克家一起随八巴到了西藏，和夏克刀登有通家之好。一九三〇年返回原籍，继任德格土司下属的白玉赠科大头人，辖差民五百多户。

一九四五年，赠伯家的差民和德格麦宿地区大头人索莫家的差民，因安姆拉巴地方的草场问题发生纠纷，双方争执不下，告到德格土司名下。降央伯姆责成“业夏勒空”调处解决，俄马相子受命后，指令双方都拿出历史依据。在双方都拿出德格土司发给的草场界线书后，赠伯方面认为：索莫家的草场界线书，文字是过去的，官印是新近的，（因德格土司的旧官印，在十二代土司继位后清军占据德格时丢失，以后镌刻的新印，和旧印在花纹上略有不同）不能作为依据。索莫方面认为：赠伯家的划线书，纯系伪造。这样，双方在德格更庆争执了一年时间，没有结果。后经浦马头人若郎、多日头人阿郎、结穷头人泽刀、康都头人呷刀等居间调解，双方又各自带了一些人到了发生争执的安康朵那进行实勘，也没有成功。赠伯拉甲为此带领部属离开了调解地点。

索莫泽多为此事分别到德格土司和德格县政府两处诉讼。德格县长管履思和降央伯姆联合发出通知，要赠伯拉甲再次到德格县城听候裁处。降央伯姆同时派小头人梅朵荒扎去玉隆给夏克刀登送信，告知赠伯拉甲和索莫色多发生争执和调处失败的情况，要夏克刀登劝解赠伯拉甲到德格再行解决。

夏克刀登得信后，派侄儿夏克郎加多吉去白玉赠科劝说赠伯拉甲应该去德格听候调处。赠伯拉甲于是带了十多人枪前往德格。但在路经麦宿杂轮岗时，遭到预伏在那里的索莫色多等数十人的袭击，赠伯拉甲和六名随员以及带去进行辩论的两名较有名望年龄八十多岁的老人等，被当场击毙。赠伯拉甲的另一随员，也还击打死了索莫色多的儿子索莫翁登和随员二人。索莫色多的部属又在自己的官寨前袭击了赠伯拉甲的先进驮运人员，抢窃了他们的全部财物，把赠伯拉甲的得力助手、负责押运行李的鄂穷马在官寨附近处死。

3. 赠伯拉甲被杀后各方面采取的措施

赠伯拉甲被杀后，索莫、结穷两家知道对方必然要进行报复，先就有组织的退守到地势较为险要的麦宿绒麦浦地区。

降央伯姆在得知赠伯拉甲被杀以后，又派梅朵荒扎去玉隆给夏克刀登送信，告知赠伯拉甲不幸被杀，她感到非常难过。已派出“业夏勒空”的聂清其麦贡布、绒甲色呷和俄马日郎、勒依大头人泽汪仁真、麦宿大头人洛日布呷、甲拉大头人阿勒、甲打头人白马邓登等率部从西方向包围了绒麦浦地区。邀约夏克刀登派部封锁绒麦浦的东方一带，共同逮捕凶手到更庆听候审处。

夏克刀登得悉赠伯拉甲被杀和得到降央伯姆的指令后，即派侄儿郎加多吉从玉隆和柯鹿洞组织了四百人枪，邀约包围了索莫、结穷所在的地区。

其麦贡布等人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即派麦宿绒麦小头人结绒泽绒带信给索莫色多和结穷泽多，要他们交出凶手，到德格更庆听候土司处理。索莫、结穷拒绝接受上述条件，提出：这次事件主要是因为结穷色多的母亲刚病故三天，听说赠伯拉甲准备在他们做丧事时袭击他们所造成的。现在事已如此，愿意按土司家的法规赔偿命价和财产损失，不同意交出凶手。

结穷泽多悄悄从西方包围中出来，到了更庆，求见降央伯姆和俄马相子，意图申诉事件经过，愿代凶手听候处理。降央伯姆和俄马相子因避嫌没有接见，把他径直交付国民党德格县政府暂行关押。同时，又严令包围在绒麦浦的部属，务必捉获杀死赠伯拉甲的凶手。

就在这时，被包围在绒麦浦地区的结穷家、索莫家的人众，突然从格德土司部属的防区内潜逃出走。在夏克郎加多吉得悉这一信息时，结穷等已走脱两天时间。郎加多吉立即组织百余精干马队进行追击，德格土司的部属也随后跟进。当追兵到达白玉赠科地方时，结穷、索莫两家的八十余人，已逃过昌台，奔趋理塘方向。郎加多吉等只好放弃追击，撤回各自辖地，留下白马邓

登、绒甲色呷率领三十余武装，负责看守索莫家留在安姆拉巴地区的七十余户牧民。

对于这次结穷、索莫两家的突围逃跑，夏克刀登十分不满，认为是得到降央伯姆、俄马相子的支持。从此，进一步增加了夏克家与德格土司之间的矛盾。

两个月后，赠伯家在巴塘冷卡寺甲本(百户)大头人、巴塘折果麻部落的头人等，共组织三十余人，会同赠伯家的部属三百余人，袭击了索莫家居住在安姆拉巴地区的牧民，当场打死牧民布呷、娘绒、马色多吉等人以及当晚留在牧场的四名理塘商人，抢走牛三百多头，马十多匹、羊五十多只，还杀死部分牛羊。

事件发生后，白马邓登、绒甲色呷先派随从呷加和泽汪罗布到更庆送信，向德格土司报告了情况，接着，白马邓登又亲自赶回德格，向“业夏勒空”作了详细汇报。降央伯姆等为了防止赠伯家对安姆拉巴地区牧民的再次袭击，即令绒甲色呷把安姆拉巴地区剩下的牧民和牲畜，全部搬迁到八邦一带。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又召集夏克刀登和五大国师寺的活佛以及三十个大头人，共同商讨对上述事件的处理办法。公举了白玉寺活佛呷马拥色达瓦(呷马拥色的弟弟)和其它四个寺庙的代表以及“业夏勒空”的全体成员，大头人中较有威望的沙呷头人洛群、俄马头人日郎、江卡头人额郎、勒依头人泽汪仁真、冷卡头人其麦多吉、其朵头人土登、露然头人布卡等，组成了“巴姆勒吉”(居间调解人)进行解决。赠伯拉甲的妻子扎拥(是索莫色多的侄女)带了得伯青批等二十余人一方，从德格县政府临时关押释放的结穷泽多带了安姆拉巴地方的阿达、阿安等六、七人为一方，进行了谈判，经过六个多月的调解，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甲打头人，现任德格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白马邓登提供：夏克刀登曾向他说过，在那次调解中，夏克刀登坚持罢土司革除索莫、结穷两家及其追随者康都、雪塘两家大头人的世袭职务，贬为差民，并赔偿命价。俄马相子则坚决反对这一

意见，提出：双方都打死了人，按照土司的法規，應是按双方打死人的數目互相抵消。哪一方如還多打死有人，再按例賠償命價。雙方均堅持己見，爭論十分激烈，其餘活佛、頭人，多持騎牆觀望態度，有的還借故離開了調解地點，致使調解並無結果。

雙方談判破裂，夏克刀登帶人返回玉隆。原夾押在邊境的結窮澤多等，也被在八邦地區的七十多戶牧民劫出逃走。夏克刀登得悉後，又派郎加多吉和親信扎西烏金次登率部到白玉阻截。結窮澤多到達麥宿得悉前有阻兵，即改變了原去理塘的打算，隨帶五名親信，轉去玉樹投靠了馬步芳和當地的扎烏頭人。其餘七十多戶牧民，全部被郎加多吉俘獲，收繳了他們全部武器，押解到玉隆，為防止他們集體逃跑，被分散安置在附近的八個牧場，成為夏克家的差民。

夏克刀登與德格土司矛盾的激化

在經歷上述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夏克刀登一直懷疑降央伯姆對上述事件事前就有所謀算，事後又進行袒護，因而對降央伯姆極為不滿。加之夏克家在趕走結窮、索莫兩家之後，白玉一帶都成了他的統轄範圍，實力大為增強。即在玉隆公開打出反對德格土司的旗號，提出要廢除土司制度，廢除烏拉差役，建立“米色甲考”（譯意為人民的國家）在康區實行“康人治康”。派扎西烏金次登等人到麥宿地區，把結窮、索莫、雪塘三家的土地、房屋、糧食等分配給他們原來的科巴差民。這一行動，受到了當地貧苦差民的熱烈擁護。白玉寺附近的差民，在上述行動的影響下，也趁機趕走了德格土司派往當地的“宗本”（漢譯為縣長），推舉差民白馬群迫為自己的“宗本”，得到了夏克刀登的認可。夏克刀登還派親信年楚仁青擔任白玉河坡地區的“錫聚”，委派當地的麥日四郎，委謝澤巴為管事，派扎科活佛白馬額郎擔任白玉熱卡地區的“宗本”，委派親信、當地頭人年楚拉甲擔任白玉贈科地區的“宗本”，委任當地差民俄拉翁真為白玉八絨地區的“錫

聂”，差民若吉伯扎为藏杂地区的“锡聂”等等。这样，白玉地区全部换由夏克刀登的亲信掌权。

据当时统计，在德格土司的辖区内，五所有国师封号的寺庙，除八邦寺持中立外，其余都支持夏克刀登，在三十个大头人中，有十五人完全站在夏克刀登一边，其余头人，也大都随风转舵不愿明显的支持一方。夏克刀登的实力，在白玉、石渠、邓柯一带，已占有绝对优势。甚至在江达和德格的龚亚、柯鹿洞等地，也有相当一部份头人支持夏克刀登。还有不少贫苦农牧民，积极响应夏克刀登提出的不向土司服差役，不向土司缴赋税的号召，逃往夏克刀登统治的区域，受到了夏克刀登的保护。

一九四九年，结穷泽多在玉树病死后，他的侄儿邪莫吉美赤乃等十八人又组织武装，准备攻打玉隆，与夏克刀登拼一死活。在此同时，他们截劫了夏克家所属拉亚寺由康定运往马尼干戈的商品，杀死夏克家经营商业者一人，并割下耳朵，附上恐吓信一封送与夏克刀登，表示要誓报前仇。夏克刀登也派遣所属头人，带领一百二十余武装，开赴玉树，要求青海马步芳驻玉树的罗特派员（当时已起义）和当地扎乌头人，协助缉拿抢劫杀人的凶手。对此，罗特派员一方面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另一方面又联络扎乌头人加强了武装戒备。嗣后，罗特派员以请吃饭为名，逮捕了夏克家在玉树的武装头目，同时出动部队袭击了夏克刀登的部属，经过激烈的战斗，夏克家的部属伤亡惨重，终因兵力不支，溃返玉隆。夏克刀登在这一事件中，遭到失败挫折，使夏克刀登和降央伯姆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四、德格两大集团矛盾的彻底解决

就在德格土司和夏克刀登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德格地区。夏克刀登和降央伯姆都派人欢迎解放军，表示拥护解放，经过多方面的

工作，夏克刀登被安置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省长，降央伯姆被安置为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在酝酿建立德格人民政府时，通过充分协商，由德格土司派出相子绒甲色呷担任县长，夏克刀登派出扎央贡呷降村和甲拉阿勒担任副县长。在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降央伯姆、夏克郎加多吉互献哈达，并向军代表方光同志再次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和睦相处。至此，德格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械斗，通过党和政府的教育说服，才得到了彻底解决。

一九八三年四月

炉霍政教合一的大祈祷法会

郎加 译呷提供资料 来作中整理

炉霍县（大祈祷）法会，（注）是一次政教合一、以宣扬喇嘛教为主的宗教盛会，已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每次从头年藏历十二月十五日开始筹备，至翌年正月十九日结束，一年一度。每届动用主持和服务人员数百人，耗费财产无算。主会期为藏历正月初八至十九日，届期全县男女老幼、僧俗各界都要赶来参加或观摩朝拜，用以维护宗教，显示威仪。现将它的由来、程序、特权等叙述如下：

（一）炉霍大大祈祷法会的由来

传说中的拉萨大祈祷法会

据传，在公元前五一一年，释迦牟尼于藏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日的十五天内，在印度甲布靠等地曾当众施展各种神变，借助神灵施展法术。公元一四〇九年藏历正月，喇嘛教黄教（格鲁巴派）祖师宗喀巴为纪念释迦牟尼，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一次大祈祷法会。宗喀巴逝世后，此会曾中断过一段时间，到二世达赖更登嘉措时，又开始恢复。以后年年举行，成为常例。并把藏历正月称为“神变月”，说在这个月内，无论你行善作恶，都会以一

注，大祈祷法会，藏语音译为“殿那钦波”（ཏེན་པ་ཇིན་པོ་），俗称“传大召”。

变为十万。神变月期间的大祈祷法会，主要召集西藏三大寺全体喇嘛、扎巴在大昭寺举行，一方面为众生“消灾免难”，进行祈祷，另方面向僧俗人等讲经传教，祝福佛教繁荣昌盛。以后，各地来西藏朝佛的人，也都愿在拉萨参加这次大祈祷法会，借以开阔眼界，参神拜禅，增长见闻。

大祈祷法会在开始一段时间，据说，主要是讲经、开愿、祈祷、传教，没有收纳布施，也没有什么特权、刑罚，甚至没有大型的宗教仪式。后来，历代达赖不断对法会增加宗教和特定的内容。到了五世达赖洛桑嘉措掌教时期规定，拉萨大祈祷法会在通过辩论佛经，从喇嘛中选拔格西，充实寺庙上层人物时，只允许三大寺和拉萨附近格鲁巴派（黄教）寺庙的喇嘛、扎巴参加，其它教派均在排斥之列。并且只有黄教的喇嘛、扎巴和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各级官员，才有分享法会布施的权利。还规定在法会期间，由哲蚌寺的铁棒喇嘛接管和负责维持拉萨市区的内外秩序；寺庙还有权调集僧俗和贵族家丁，扮演古装蒙古骑士，参加送鬼仪式，以壮寺庙和领主的声势。这样，就使拉萨的大祈祷法会，改变了原来单纯为了宣传宗教活动的性质，而成为显示僧侣、贵族声威，实行政教合一特权的活动场所。

炉霍大祈祷法会的由来

公元1617—1682，甘孜县扎科桑珠寺创建人霍尔·曲吉昂汪彭措在康北修建了十三所黄教寺庙，1650年修建的霍尔·章古寺（即后来的炉霍寿灵寺，以下统一称为章古寺）是其中之一。以后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认为，章古寺的建全、发展，对于扩大他个人的声威和影响，巩固他在炉霍的统治地位，将有重要作用。考虑到西藏是黄教的发源地，是宗喀巴发迹的地方，因而决定向西藏方面请求帮助他解决三件事：一、要求西藏派一名德高望重的喇嘛，来主持章古寺；二、请求西藏赐予一尊佛象，作为章古寺的主佛；三、按照宗喀巴为黄教创建拉萨大祈祷法会的

先例，请求西藏具体指导炉霍章古寺建立大祈祷法会。

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还为此派专人去西藏同一位原籍炉霍、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取得僧官职位，受五世达赖重用的老喇嘛则伍斯郎泽仁（现炉霍泥巴公社呷巴生产队的人）取得联系。老喇嘛答应愿意全力相助，并要正吉·德瓦夏巴亲自到西藏联办此事。要求他来西藏时，排场大些，造成声势，以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视。当时炉霍土司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但因这件事关系重大，于是在经过一番准备后，就带着二十多个随从，几十驮绸缎、茶叶等货物去西藏。

老喇嘛在得到炉霍土司出发的消息以后，即在拉萨为他大造舆论，极力提高炉霍土司的声誉和地位，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在炉霍土司到拉萨时，要以隆重的欢迎仪式进行接待。又提出，当年拉萨大祈祷法会的全部布施，统由炉霍土司完全承包，这些要求，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法会主办机构羌让德巴的允准。

当炉霍土司一行快到西藏黑河时，老喇嘛已暗地派亲信赶着几十匹骡马，来到黑河等候迎接，并带信告炉霍土司说：你到拉萨的那天，我会到拉萨城外门珠桥来接你的驾，你要佯装大发雷霆，质问我为什么只到城外来接你，并下令当众抽我的皮鞭。我在西藏是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就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中，我说的话一般也没有人当面反驳，而你敢于当众抽我的皮鞭，就会很自然的抬高你的威望和身价，有利于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炉霍土司开始对要当众抽老喇嘛的皮鞭感到为难，但事已至此，也只好照计行事。由于炉霍土司在门珠桥边当众抽打了老喇嘛的皮鞭，群众又见炉霍土司随带那样多牲畜、货物，都以为炉霍土司既富有、又威严，所以一到拉萨，影响就非常大。

再由于炉霍土司事前就包下了当年大祈祷法会所需的全部布施，很多想上布施的人，就直接带着进见礼请求炉霍土司允许他们也能上些布施。进见礼的银子，有的送一百并（西藏一并银子折合市秤为五十两），有的送二百并。这样，炉霍土司就收下了很多

银子，并用这些银子在当年大祈祷法会上多次发放布施，成为在拉萨大祈祷法会上每个扎巴得布施最多的一个施主。炉霍土司还通过老喇嘛向五世达赖献了大量丝绸、锦缎、金银珠宝以及各类兽皮等贡品，邀请五世达赖在大祈祷法会上坐台讲经，更促使炉霍土司的名气越来越大。按西藏习俗，一般人朝见达赖是很不容易的，但炉霍土司通过老喇嘛和自己的交往，可以经常朝拜达赖。经过两年时间，五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答应了炉霍土司的以下要求：

一、派四名精于尼泊尔手工艺的银匠，到炉霍章古寺塑造一尊银质的释迦牟尼佛像，作为章古寺的主佛。佛塑造好装入咒文经卷后，佛殿大门关闭七日，由达赖发起哲蚌寺的护法神勒穷其雄从西藏给释迦牟尼佛象开光，迎请神佛进入偶像。五世达赖还亲自赠送给章古寺非常珍贵的第三佛迦叶和释迦牟尼的舍利作为佛象内藏。准许章古寺按佛教的规定，以具有特别珍贵的经卷、佛象、佛塔为特征，在释迦牟尼佛殿顶树立金顶。

二、五世达赖告诉炉霍土司，在色拉寺（西藏三大寺之一）半山腰岩洞里住着一位坐禅的老喇嘛，因为他住的岩洞是雕鹰存身的地方，所以得名“格聪”。要炉霍土司亲自去山上请求格聪到章古寺住持，并说，如能得到允诺，章古寺就会功德无量。炉霍土司按照五世达赖的指点，找到了格聪，当时格聪正在念经，不能讲话，只是在听了炉霍土司的请求后，点了点头。炉霍土司回来向达赖讲了他见到格聪的情形，达赖高兴的说，这就对了，老格聪逝世后，他的转世将出生在你们炉霍的地界，那就是你们章古寺的住持活佛。数年后，第一世格聪活佛就在甘孜得村的农户家出生，名叫邓贞亚及，到解放时，章古寺的住持已经是第四世格聪活佛了。

三、正吉·德瓦夏巴在西藏居住两年，亲身考察了每年拉萨大祈祷法会的盛况，并得到以五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名义为炉霍章古寺制定的、内容基本上与拉萨大昭寺大祈祷法会相一致的

《霍尔·章古寺大祈祷法会规章》。后来，正吉·德瓦夏巴的弟弟青则·洛桑克珠，在格聪活佛还没有主持章古寺前，担任章古寺住持期间，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教合一的土司和宗教制度，根据炉霍的具体情况，又为法会规章补充了若干条文。

在达到上述三个目的以后，正吉·德瓦夏巴离开拉萨，返回炉霍，着手筹备章古寺大祈祷法会。

（二）炉霍大祈祷法会的组织和有关仪程

炉霍章古寺大祈祷法会有一整套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木郎德业。它是负责主办和管理法会有关筹备和具体事务的最高办事机关。

木郎德业分僧俗两方，由寺庙和地方头人联合组成。僧方木郎德业由寺庙住持活佛指定曾在寺庙担任过各种高级职务的长者一人担任。下设管事一人，厨师一人。僧方木郎德业还有权从寺庙扎巴中，指派二人管理木郎德业的土地，其任期为一年至三年，期满后，由本人提出辞呈，经寺庙住持活佛批准后解职。

俗方木郎德业，由土司所辖世袭相子（即总管）充任。下设秘书一人，管事一人，管事助理四人（两人管内务，两人管外勤）房管一人。以上七人均由相子指定，可以随时撤换，也可连年充任。自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任命汪修战登为霍尔·章古寺世袭相子以来，到解放后进行民主改革（一九五六年）时的相子扎西郎加为止，已经为世袭第九代了。

僧俗两方木郎德业，于每年藏历十二月十五日开始联合办公，负责摊派各种乌拉差役，掌管法会期间的一切经济开支，处理日常事务。木郎德业的领导机关，设在寺内大殿右侧巴觉绕登（富饶永恒之意）大楼。

法会期间要设置首席活佛、领经师、铁棒喇嘛等神职人员，其来沅、职责、仪程等情况是：

首席活佛：在每年大祈禱法會前，由寺廟的坐台喇嘛等六人會議（即寺廟管理日常事務的常設機構）擇吉于藏歷十月，按寺廟規定，邀請一位屬於康區十三所黃教寺廟中的住持活佛擔任，負責在法會期間坐台講經、傳教、開愿、祈禱等。

首席活佛按規定可帶隨從八人，即經師一人，廣通經義的喇嘛二人，管家一人，進呈飲食者一人，奉送酥油茶者一人，燒茶者一人，馬夫一人。同時，寺廟還要在當年從西藏受戒回來的扎巴中，指定十人為首席活佛服務。其中，打黃傘者一人，吹噴吶者二人，提金、銀香爐者各二人，提“打雨”（用豹皮裝飾的一種供物）者二人，捧披風者一人。另在康區差民中，指定一人，身著官服，為首席活佛舉香引路。地方的四個保正，要輪流派來馬夫差一人，背水差一人，供作役使。

領經師：法會期間，領經師由本寺大經（平時在本寺念大經時的領經師）、法相（採用辯論的方式研究佛學的喇嘛）、密宗（以修學密宗為主的喇嘛）三院的領經師三人負責，並在本寺喇嘛中挑選熟悉經典、聲音宏亮者七人，為領經師充任助手。他們可以選派燒茶者一人，取油茶者二人，雜役二人，為之服務。

鐵棒喇嘛：法會期間，由寺廟大、小鐵棒喇嘛二人，“格約”喇嘛（即鐵棒喇嘛的助手）四人，負責維持治安、處理官司案件。並由寺廟在所屬八個轄區選出有聲望的長者十六人，協助維持秩序。按規定，他們也可選派燒茶者一人，取油茶者二人，為之服務。

嘛里喇嘛：章古寺的嘛里喇嘛任期為三年，兼任法會期間的嘛里喇嘛，負責在法會期間于每天下午在講經院向男女俗人講嘛里經，接受為超度死者的布施。嘛里喇嘛可選派給隨從二人，取油茶者一人，為之服務。

法會期間，大殿、經堂的供物、旗幡、祭品，以及念大經、講經時劃分地界、鋪設藏毯、管理千燈、千供等事項，均由原寺廟負責管理經堂、大殿的香燈師四人，阿本（負責管理大殿佛像

的喇嘛)二人专门负责。并从俗人中派差民十人,负责打扫清洁卫生。

法会期间,从藏历正月十五日开始,要做元宵供,由十一人负责。他们是供品官一人,做供僧十人。

法会期间,寺庙还要进行一次经典测验仪式。负责主持测验经典的喇嘛——“雄冷巴”,要负责组织当年从西藏回来的格西和在西藏学经四年的呷举,进行宗教理论测验。在每天早上首席活佛还未讲经之前,在寺庙讲经院内就寺庙法相院的喇嘛、扎巴所提出宗教理论问题,进行答辨。

关于首席活佛进离寺庙前后的仪程,也有一定讲究。主要有:被确定为首席活佛者,在莅临章古寺前,需要择定吉日,通知寺庙“六人会议”,由寺庙派一小铁棒喇嘛和“六人会议”一名成员,以及举香者一人,提前去首席活佛住地迎接。再由“六人会议”通知寺庙“十六日会议”(即每月十六日,寺庙按例要召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格聪活佛、其它各级首脑人物,共为二十二人。由“六人会议”向其汇报日常事务,请示、研究寺内重大问题),以及全寺格西、喇戈(在西藏学经四年的呷举,又担任过三年章古寺的嘛里喇嘛和担任过三年负责测验经典的雄冷巴,以及担任过四年洛五沟土司家庙首席喇嘛的人,称为喇戈),各自按等级,穿官服、法衣,参加迎接,寺庙八个管区内的十六名长者,也要分别通知全寺喇嘛、扎巴中有马的人,盛装备马,参加迎接。

寺庙还要在八个管辖区,各派十名扎巴,手持黄伞和各色旗幡,吹唢呐、海螺,参加迎接。

“六人会议”同时要通知僧俗木郎德业,由木郎德业通知康团的保正、村长和全体男性差民,穿戴节日盛装,在相子的带领下,骑马参加迎接,仪式相当隆重。

僧俗木郎德业,要在首席活佛到达寺庙之日后,从康团中派遣一人身着全套官服,负责在首席活佛外出时,举香引路。举香者

可带随从一人。这一习俗，据说当年土司在世时，为首席活佛举香者，是由一个有地位的人担任的，因而他也可以带随从一人。以后这一差事逐步改由从康团中指定一名较富有的差民担任，故仍沿用前例。举香者从活佛进寺之日起，可同活佛一行同住一楼，首席活佛每次外出念经，都要由举香者引路，举香者可同首席活佛的其它随从一样，得到一份布施。

从首席活佛进寺之日起，首席活佛一行的马草、马料、灯油、烧柴等，都要由木郎德业负责保证供应。

首席活佛在法会结束离开寺庙之前，六人会议要在寺庙会议厅设宴招待。木郎德业要事先从四个保正辖区内，各摊派藏洋四十元，共一百六十元，合银子一并，在宴会结束时，献给首席活佛。

首席活佛在离开寺庙时，要同迎进寺庙时一样，由前述人员护送到指定地点。送行者要再次向首席活佛敬献哈达。首席活佛则要亲手将所献哈达挂在各人脖子上，并亲自赠送给金刚结各一个和少量干果。

首席活佛在告别时，要亲自给相子挂上各色彩绸和上等哈达，以示感谢。

（三）大祈祷法会的经济来源和各种乌拉差役

炉霍章古寺大祈祷法会的经费来源，主要由炉霍土司利用封建特权，向群众强行摊派。具体有以下几种：

终身高利贷：在炉霍全县三分之一的差民中，发放藏洋高利贷，计有四十元，年利三元；一百元，年利八元两种。

另在炉霍县三分之二的差民中，发放酥油高利贷，在每年法会时，由木郎德业用专用秤收交酥油。其中一部份差民放给藏洋一元（藏洋和银元的折合比率，根据时间、地区和藏洋的种类不同而有差异，一般说来，在解放前的甘孜、炉霍一带，通常为五

元藏洋折合大洋一元)每年付利息酥油十一斤;一部份差民放给藏洋半元,每年付利息酥油七市斤半。

属炉霍土司管辖的甘孜县绒坝岔林冲地区(现在是甘孜县绒坝岔区卡公公社),有一百三十多户差民,他们同炉霍差民一样,要接受土司摊派给的终身高利贷。

地租:炉霍土司拨给木郎德业种植二百袋种籽(每袋为一百市斤,可下种约三亩)的土地,由木郎德业分摊给部份差民耕种,多者一户三袋,少者一户一袋。每年收获的粮食,按规定上交百分之五十,作为法会的一笔经费。

布施:法会期间,给全寺喇嘛、扎巴发放布施的资金来源,有以下三个方面:

- 1、寺庙四大会首经营商业的任期届满,其所获利润中,应归个人所得部分,一般均献交木郎德业作为法会布施的一笔资金;

- 2、富裕人家和喇嘛、扎巴中家庭较富裕的,要专门向木郎德业献一部份法会布施资金;

- 3、寺庙中无亲属的喇嘛、扎巴死后,将财产变价献给木郎德业,作为布施资金。

木郎德业将上述三方面的资金,平分为四份,分发给寺庙四大会首放债,每并银子(合一百六十个藏洋)年利百分之十五,每年法会前收息作为布施专用款。

法会布施资金交给寺庙四大会首发放的理由,主要是四大会首掌管全寺经济大权,经济实力雄厚,每年到时可保证收回利息;再是法会布施资金利息为百分之十五,低于一般利息,对四大会首有一定经济利益;第三,由四大会首付息的布施资金是永久性的,他们可以据此经营商业,在寺庙的商业发展后,布施资金又可随之增加。

据传,原来法会的布施资金数量并不多,原因是有的施主一次献二百至三百个藏洋,不够单独发放一次布施,法会只好等几户施主所上布施加起来发放一次。那时,法会期间除念大经时上

茶外，整个法会仅发放几次为数不多的布施。后来寺庙经营商业，生意越做越大，僧俗中私人经营的商业也不断增加，向法会上的布施也越来越多，有的一户竟上布施达五十并银子。这样，一户施主就能单独供全寺发放布施一次。法会期间的布施有四种，每个喇嘛、扎巴发一元藏洋，每两人发一元藏洋，每八人发一甌茶；十人共发一甌茶等。全寺有一千九百多名扎巴，他们需要的布施，加上因等级地位不同增加的布施（地位最高的活佛，一人可得布施十三份），每年实际发放的布施总数，大约为二千三百份左右。

法会期间群众另外捐献的财物，收取的私人念经费，以及处理案件的罚款等三项收入，按例应作为法会的活动资金。这笔资金在僧俗人中放高利贷，年利为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六年，大约有三百五十并银子，折五万六千个藏洋，约合大洋为一万一千二百元。

法会期间，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布施。就是每年从藏历十二月十五日起，由施主向木郎德业提出请求，经批准后，安排日程，然后通知施主，在规定日期，带上布施，到寺庙大殿门上等候，待念经散会时，由木郎德业监督，施主直接向全寺喇嘛、扎巴发放布施。

元宵供资金：根据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创办大祈祷法会时，曾于正月十五日陈列元宵供（用酥油做供品）的旧例，护霍章古寺也要在每年法会期间，陈列元宵供，并有一笔专用资金，计青稞二百斗（每斗四十斤），藏洋四百元，酥油四百斤。这些资金，轮流在全县四个保正（雅德、尼巴、尼木、斯木和仁达）管辖区的差民中，摊派给两户较富裕的差民，年利为百分之五十。每年藏历十二月十五日向木郎德业付息。并按规定每年向法会相子、僧方木郎德业各献牛肉一腿，青稞二斗，青稞酒一角（用野牛角盛装，约有市秤十斤左右）。

酥油红米粥资金：法会期间，在每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

三日，规定要向参加大殿念经的全体喇嘛、扎巴上酥油红米粥（类似汉族的八宝饭）三次。有几户施主贡献这笔资金，为藏群三百二十个，平均分给四大会首，每年付息交实物红米五十八桶（每桶为十二市斤），酥油二百二十斤，牛肉四腿，盐巴一大斗（约四十斤），各类干果数袋。用以上食物供上两次酥油红米粥。另一次则从木郎德业活动资金中开支。

千灯千供资金：凡要供千灯千供的施主，在头年法会结束后，每户必须交纳大约为青稞六千斤、酥油一千斤以上的千灯千供基金，由木郎德业将此基金交付寺庙中的四大会首放息，年利为百分之十五。翌年法会时，由四大会首将所得利息收入，指定专人做好每户施主需用的千灯千供实物，即每户需要有一千盏酥油灯，一千个糌粑供，约需实物为酥油一百五十斤，糌粑一千斤，交与木郎德业安排日程，然后通知各户施主。各施主在被安排敬献千灯千供之日，前来叩头和献哈达。到解放后，全县献千灯千供的施主有二十多户。

长明灯资金：法会期间，可以有六十多户施主献长明灯六十多盏，每盏长明灯资金是两并银子。这些资金也要在事前交付给四大会首。在每年法会期间，用大铜锅做好六十多盏长明灯，每灯约需用酥油三十斤左右，由木郎德业在每盏灯上用木牌写上施主的姓名。

大祈祷法会期间的乌拉差役，也名目繁多，由全县差民承担。

原炉霍县城老街，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小镇，镇内有三十多户藏族，称为“康团”。康团的差民是为炉霍土司传达各种乌拉差役命令的。康团中又有八户差民，专为章古寺大祈祷法会传令。在每年藏历十二月十五日，这八户康团差民要向木郎德业办公处报到，一直到法会结束。

法会期间具体的乌拉差役计有：

草差：支应马差的差民，每户负责上青草一百斤，干青草一

百斤，支应牛差的差民，每户负责上青草五十斤，干青草五十斤。

柴差：支应马差的差民，每户负责上柴十二驮，支应牛差、人差的差民，每户负责上柴六驮。

杂差：负责烧茶、上茶、铺地毯、打扫大殿、管理瓢桶，维持大殿周围环境卫生等杂差，共为八十多人。由四个保正分年轮流支派，如当年需要量较大，支差人数超过八十人时，超过的要付予工资，每人大约为藏洋十七元左右。服杂差的人，他们的饮用茶由八人负责管理。住在木郎德业大灶处，直到法会结束。

土罐差：呷巴、斯几两村特产土制瓦罐，在法会期间，这两个村子每户要上交土制灯窝五十个，洗手盆一个，茶壶一把，便壶一把。

草绳差：格卡、俄日两村特产草绳，在法会期间，每户差民要负责交草绳十二排（用两手伸直的量度，一排约五市尺）。

土碱差：绒巴弄、热巴、古依三个村附近有温泉，产土碱，法会期间，这里的每户差民要负责上交土碱一斗（约十斤）。

木桶差：邓达沟、仁达沟有部份木工，法会期间，每户会木工的差民，要负责上交木桶、木瓢各一个。

柏枝差：雅弄、交纳、古热三村柏树多，在法会期间，这里的每户差民，要负责上交柏枝一驮，柏树条十根。

柳条差：茶溪卡、各他弄两村，盛产柳条，在法会期间，两村要各上交柳条一背。

磨房差：洛尔沟村每户都有磨房，每年要有两户差民负责为法会磨粮食。

（四）法会期间铁棒喇嘛、木郎德业和相子的封建特权

铁棒喇嘛的封建特权

按照拉萨大昭寺大祈祷法会的规章，法会期间的“官”只有哲蚌寺的铁棒喇嘛，“神”只有护法神勒穷其雄。因此，在法会期间，哲蚌寺的铁棒喇嘛，有权接管西藏地方政府一切司法权利，维持市区和法会内外秩序。

炉霍章古寺也沿用此例。即在法会期间，寺庙大小（即正副）两个铁棒喇嘛，负责接管全县的司法大权，维持全县治安和法会秩序。国民党炉霍县政府因要和地方的民族、宗教上层搞好关系，同时这一行动对他们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等又无什么冲突，对这一旧例也抱无所谓和佯加支持态度，如每年在大祈祷法会前，县政府要在章古寺跳神院大门左侧张贴告示，宣布在法会期间，将本县境内的一切司法权利，移交给章古寺大祈祷法会铁棒喇嘛。并接受在大祈祷法会期间，监狱不得关押犯人的规章，对在押犯人，于法会前尽量处理结案；部份一时不能处理结案的犯人，大多数可保释回家；个别案情重大不宜保释的，也要在法会期间押离县境，转移到与道孚、甘孜等县交界的地点甲古弄或然柳村等地看管。

章古寺平时为处理寺庙的日常事务，按例要设置上级法庭和下级法庭。

上级法庭，由坐台喇嘛为首的六人组成。坐台喇嘛要选择一名原是章古寺的扎巴，经派去西藏哲蚌寺、后藏扎西伦布以及拉萨下密咒院三处长期学经典（一般学经在二十年左右），并经拉萨大祈祷法会测验，取得各级格西学位后回章古寺的人员担任。坐台喇嘛任期一般三年，如没有新的格西接替要继续连任。坐台喇嘛可以指定温波（即助手）一人。寺庙住持喇嘛再在四个管辖区内各指定有能力的长者一人，此四人任期为一年。以上六人是上级法庭的合法组成人员。他们每天要在寺庙会议厅办理日常事务，包括处理案件，调解纠纷等等，并在寺庙内设有两处监狱。

下级法庭，由大、小两个铁棒喇嘛组成。由寺庙住持活佛将

大、小铁棒喇嘛任命名单密封后，送交上级法庭。上级法庭于每年藏历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左右，在寺庙的四个大门完全关闭之后，当众启封，然后派温波将任命名单亲自交给被任命的大、小铁棒喇嘛。这样做，是因为铁棒喇嘛的责任繁重，积怨甚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被任命为铁棒喇嘛的人，在提前得知自己被任命为铁棒喇嘛后，因不愿担任而发生逃跑或自杀的情况，所以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法。担任大铁棒喇嘛的条件，必须是经过在西藏学经四年的喇嘛，小铁棒喇嘛也必须是过去西藏受过具足戒253条（主要是戒淫、盗、杀和妄）的人方能担任。

每年藏历正月初五，由寺庙主持活佛和上级法庭的组成人员，于中午时间，在会议厅召见下级法庭的大、小铁棒喇嘛，以及他们的助手“格约”等四人，法相院的“巧日”（即管理人员）一人，寺庙的三位领经师和协助领经师的助手七人，并向他们献“谢玛”（糌粑上用酥油装饰，以示吉祥之物）敬茶。由寺庙住持活佛正式宣布：从今日起，将大祈祷法会期间寺庙的一切司法权利移交给铁棒喇嘛，法会期间的一切程序，都必须严格按照五世达赖制定的章古寺法会规章执行，违者严惩不贷。然后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共念“吉祥经”。祝当年法会圆满完成。坐台喇嘛再将法会规章（盖有五世达赖印章的绢制品）亲手交与大铁棒喇嘛。散会后，由巧日在前面高举“夏甲”（是佛教认为能够逢凶化吉的一幅图画），两个扎巴手举彩矛，大小铁棒喇嘛等人依次排列。去法会铁棒喇嘛住处“斯木康则”（炉霍四个保证管辖区之一，即现在的斯木公社）。一路上，寺庙扎巴、喇嘛必须低头弯腰，铁棒喇嘛的助手“格约”高呼开路（据说在很早以前，移交寺庙司法大权的程序，是由炉霍土司亲自主持。当时是大小铁棒喇嘛等人去土司官寨接受《法会规章》，土司官寨一带的老街差民，要事前打扫街道，列队欢迎。改土归流后，土司不复存在，才改由寺庙主持活佛移交）。

铁棒喇嘛在法会期间遵循的法规，一是按照五世达赖为章古

寺大祈祷法会制定的规章，二是炉霍土司的兄弟青则·洛桑克珠根据炉霍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青则·洛桑克珠规章》。主要内容是，法会期间如有人触犯上述二项法规，铁棒喇嘛有权分别情况给予开除庙籍，驱出县境，罚款，捆木桩，抽柳条鞭等处罚。

1、开除庙籍：对触犯法规者，宣布其违犯戒律，脱去袈裟、围裙，穿上白毡衫，头上戴用纸做的一尺多长的高帽，帽子两边贴着黑底的度经文，人敲“硬得”（六尺多长的一条黄色木方），通知到法会的全体僧俗人等前来观看，然后将触犯法规者赶出庙门。

2、驱逐出境：同开除庙籍一样，但赶出庙门后，要由这一村押送到另一村，最后押出县境。

3、罚款：按规定罚款有罚骑骡——人骑，和驮骡——驮东西两种。骑骡每头规定折合藏洋大约一并银子，驮骡为八十个藏洋。后来罚款的数目不断增加，如打官司的双方都比较富裕，那就更要加倍罚款，毫无限制，有的甚至被没收全部财产。当时群众中有这样的传说：只要有两家有富人打官司，铁棒喇嘛就有“好收成”。因为所有的罚款，都由大小铁棒喇嘛及其助手等六人私下平分。

4、捆木桩：将触犯法规者背靠木桩，双手反抱。木桩共有三格，第一格脚可触地，第二格脚尖可触地，第三格双脚悬空。

5、抽鞭：将触犯法规者按在地上，由服杂役差民中的烧茶者按着头，背水者用背水皮条捆其双足，然后由协助铁棒喇嘛维持秩序的十六个叩举用刑，男人抽臀部，妇女抽脊背，抽打三百至一千不等。扎巴、喇嘛和俗人中的男人，用刑一般在铁棒喇嘛住地——斯木康则；妇女用刑在四大庙门中的背水大门外，规定下午用刑。重大案件，为了显示声威，也有在大殿前跳神院用刑的。

动刑前，大小铁棒喇嘛身着全付官服，坐在铺有地毯的石台

阶上，当众高声训斥触犯法规者。大意是：你违犯戒律，按照大祈祷法会规章处罚你，打不死你，算你命长，打死了罪有应得。然后宣布动刑，用柳树条抽打，受刑者一般都要被打得鲜血淋漓，才能收场。

木郎德业的封建特权

木郎德业作为炉霍土司代表，在法会期间充当施主。土司特意授给他们可以在法会期间，强行催缴所摊派的高利贷和乌拉差役，作为法会期间的资金，并享有对有关法会期间涉及经济事务方面的惩处特权，例如：对支不起乌拉差役的、还不起高利贷的、付不起其它债务的、交不起地租的差民等，木郎德业可任意罚款、用刑。并在他们的厨房内附设临时监狱，对上述差民，任意关押。

木郎德业的刑罚有抽鞭、带镣关监、捆木桩等等。在木郎德业大楼的左侧，有二十四根木桩，专供捆人使用。对差民用刑，一般在正月十五日以前，这是因为法会以正月十五日为期，再说自正月十二、十三以后，庙内活动较多，行刑也不太方便。

在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后，青海果洛和石渠、色达等县的一部份牧民要到炉霍县境内做生意，对他们的畜产品，如法会需要，木郎德业即派人通知他们的房东，命令这些商人将酥油、牛肉交付法会使用，并按原价付给钱粮或茶叶。

十二月十五日以后，一切零星念经活动，都要由木郎德业经管，所收念经费，作为法会资金。章古寺各附属寺庙和章古本寺的各个念经组织，在此期间，一律不准接受另外的念经布施。

十二月十五日以后，凡来章古寺要求为死人超度、念“七七”大经，或有其它急事要求念经祈祷者，都必须同时承认要在法会期间向全寺喇嘛、扎巴上布施一次，如不承认这一条件，就不允许念经祈祷。因为平时住寺扎巴顶多不过八百人，念

祈祷经花费不大，而法会期间就要按寺庙实有人数上一千多份布施。这一规定，既可增添法会期间的念经活动，又可增加木郎德业的布施收入。

法会期间，除木郎德业住地巴觉绕登大楼可以吃酒打牌，唱格莎尔王传外，其余寺内都不准饮酒、唱书。

寺庙平时是不准妇女进寺的，如有妇女需要进寺朝佛、会见亲人等，必须经铁棒喇嘛允准，并有限制。但从十二月十五日起，木郎德业开始办公以后，如属为木郎德业支差还债的妇女，可以不经铁棒喇嘛允许进入寺内，只是晚上不准留住，白天可以不受时间限制。

按照“柔以化人，刚以克己”的佛教戒律，在法会期间，除僧方木郎德业外，寺内其它喇嘛、扎巴都不准穿着有袖子的上衣。

另按规定，在法会期间，俗人进庙不准脱袖；但俗方木郎德业人员可以脱袖。

从正月初八开始，法会每天上午要召集全寺喇嘛、扎巴念大经，散后（大约上午十点左右）由铁棒喇嘛派“格约”一人到木郎德业住地迎接相子、僧方木郎德业、秘书、管家、内务等一行五人，监督发放“中午布施”。布施发完以后，又把他们送回住地。迎送时，“格约”一路都高叫开路，两旁僧俗人等都要低头弯腰。

法会期间，收租、收债以及一切差役，都由老街康团差民到四个保正管辖区同每个村的负责人（每年轮换）一起催缴，如有到法会结束清理帐目时还未交清的，户数不多，数量不大时，就登记上帐，增算利息；如欠帐户数较多，数量也大，就由木郎德业、管家、内务、外勤四个助理亲自去收。每到一村，必须事先安排食宿、马夫，准备草料，并派专人侍候。欠差户还要向四个助理献“甲查”（给差官的报酬）礼，如差民态度不好，四个助理有拘留一至二日、上脚镣、抽皮鞭、罚款等特权。

木郎德业人员在法会期间的特别收入

法会期间，在僧俗木郎德业十一人中，外勤助理二人和背水役可以不带口粮，其余八人要自带粮食。其他方面的生活开支，由木郎德业负担。

法会期间，全寺喇嘛、扎巴在每次领布施时，僧方木郎德业、相子、秘书、管家四人每人也都有一份。由木郎德业经手，由寺庙四大会首付息发放的布施，僧方木郎德业、相子、秘书、僧俗两个管家、内务助理二人共计七人，可以每人提留二至三份，外勤助理、烧茶役、房管四人，每人可提留一至二份，到法会结束时，再按应得数分给个人。

法会结束时，按规定僧方木郎德业和相子，每人可用法会专用秤得酥油二斤二两（合市秤十一斤），秘书和僧、俗两个管家、两个内务助理共五人，每人可得一斤一两（合市秤七斤），其余四人每两人可得一斤一两。（合市秤七斤）（注）

相子的封建特权

因为经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任命的第三代相子汪修战登，同时担任章古寺大祈祷法会世袭相子。因此，相子不仅是在法会期间享有特权，就是平时，也享有很多封建特权。

一、收进见礼

1、木郎德业的俗方管家，是相子从差民中任命的。谁当了管家，就可被免去内外全部差役（内差，按四个保正管辖区派给土司和法会的差，外差，给国民党政府支应的差）所以不少人争着当管家。当管家的人，必须给相子送进见礼，按差民所支差役情况，在一九二六年前后的进见礼，一般为藏洋三百元左右。

注：是木郎德业的专用秤，一秤为二斤二两，一秤为一斤一两，那种新量折合市秤十一斤和七斤。

2、法会的俗方内务，外勤助理和秘书等五人，也由相子从差民中任命，担任者可被免差役。

炉霍的差民，每年由四个保正管辖区（亚德和尼巴一起，斯木和尼木一起）轮流支差，每月轮换。如能当上法会助理、秘书，可免去两个月人差和全部柴草差。为了免差，很多人争着担任上述职务，这也需要向相子送进见礼。担任以上职务的，平时相子家如有什么事体，一经通知，即需前来无偿服务。相子外出时，还要充当随员。

二、免差的庄房

相子有两处庄房，一处是原相子老家的住地，老街的土地房屋，一处是担任法会世袭相子后，炉霍土司将亚德保正管辖区新都村一处庄房赠给相子的。炉霍土司给相子盖有印章的谕书文告，文告决定相子两处庄房永远免差。

三、特殊的现金收入

章古寺大殿和木郎德业住地巴觉绕登大楼，都是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专门为大祈祷法会修建的。每年在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逝世规定的燃灯节以前，都要粉刷一新。同时还需要把土司官寨（即后来的国民党县衙门），千手观音佛堂（位于鲜水河大桥旁边），邓登经塔（一九三九年由炉霍全县僧俗捐款、派差共同修建，有十一层高，修好后，经格聪活佛会同全县僧俗头目共同商定，因大家认为邓登（伏魔）经塔可为全县僧俗人等消灾免难，所以交由木郎德业管理），“呷举扎仓”大院（去西藏学经四年回来的扎巴为呷举，“呷举扎仓”即呷举集体念经的场所，是一座内有大殿、经堂、办公楼、厨房等全套设备的独院），相子的住房（即在老街的庄房）等五处房舍也粉刷一新。除呷举扎仓粉刷为黄色外，其余几处都刷为白色。由相子派康团差民二人，在四个保正管辖区轮流派差粉刷。按需要，每年每户差民一般要交白土（当地有一种粉刷房屋需要的白颜色的土）一背。粉刷时，相子指定一部份差民支入差，一部份差民按人头交纳现金，八天一轮

换，由木郎德业的两个助理负责监工。差民交纳的现金开支，除送给支差的差民们少量买茶叶、盐巴的钱以及木郎德业的两个助理，每人可得两份，大段管理人员、阿本等六人，可共同得两份外，其余全部归相子所有。大约为藏洋三百元左右。

四、霍尔（即土司家）的土地、草场

称为霍尔地的土司家的土地，在炉霍全县有尼木保正（即现在的尼木公社）管辖区章达村约一百袋（每袋约一百斤）种籽地，斯木保正管辖区勒戈村约一百五十袋种籽地，老街约有一百五十袋种籽地。

称为霍尔沼泽地的土司的草场，有“老街草场”大约一千余亩，亚得保正管辖区的重得村附近“重得草场”，大约二百至三百亩，格沙村附近的“格沙草场”，大约为三千亩，吾日村附近的“吾日草场”，大约有六百至七万亩，吉日村附近的“吉日草场”，大约为一百亩，甲拉村附近的“甲拉草场”，大约为一百亩。

“霍尔地”，每年从春耕到秋收，都由相子负责派老街康团差民催差，由霍尔地所在附近的差民支差耕种，秋收后将粮食送到土司官寨，没有土司以后，改作为国民党县政府的收入。相子管理这些土地，在各个季节都要带上木郎德业助理等十多个随从去各村察看，各村负责人必须安排接待。春、秋两季在各村公房接待，夏季在草坝上扯帐篷接待。除准备牛肉、酥油、酒、茶等食物外，每户差民按规定要向相子送酒肉费青稞二桶（每桶十二斤），还要以村寨集体名义，送相子酒一角（野牛角，约装十斤），牛肉一腿（约七八十斤）。如发现霍尔地管理得不好，相子有权对差民进行惩罚。相子还有权解决各村寨的官司案件，直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伪县长将霍尔地全部出卖后，相子管霍尔地的特权也就从此结束。

“霍尔草场”，平时由草场附近各村差民内部安排轮流看守，秋季（大约藏历八月底）由相子派老街康团差民二人到四个

保正管辖区派差割草，按每人八天为一轮，草收割后送到土司官寨，相子可从中得草一百背（没有土司以后，草送到国民党县政府内）。每年割草前，相子等一行十余人要到各村察看草场，各村负责人也必须在草坝上扯帐篷和准备牛肉、酥油、酒等食物安排接待。各村要以全村名义，向相子送酒一角、牛肉一腿，以及酒、肉费粮食二桶。各村负责人还要向相子汇报看守草场的情况，交草场损失情况记录。例如谁家偷割了草，让家的牛羊吃了草等等，请相子处理。处理方法，一般是罚草，个别的罚款。收割草时，同样是一部份差民支人差，一部份差民交现金。现金收入除支付少量现金作为支割草差的差民茶叶、盐巴的花费，和监工可得两份而外，其余全部归相子所得，大约每年可收入藏洋三百元左右。

五、新年贺礼

每年藏历年前夕，按规定章古寺上、下两级法座四大会首、五大活佛（即 格聪，大、小瓦弄活佛，堪青活佛，向巴活佛）的管家，呷举扎仓的负责人，四个康则的会首（康则按四个保正管辖区划分扎巴的管区），四个保正，老街康团汉团的保正等，必须去土司官寨向土司祝贺新年，敬献贺礼。在拜见土司以后，这些人还要到相子和各大管家住处祝贺和送呈贺礼。土司被废除以后，改为去向国民党伪县长送呈贺礼。

离土司官寨大约十公里的洛五沟，有土司的一所小家园，是土司常去坐静的地方，还有鲜水河大桥旁边的一所千手观音佛堂，在每年藏历四月初十至二十六日，这两处都要由土司出资金举行哑巴经会。经会会首由土司和相子研究，在四个保正管辖区指定二人轮流担任。并按每户一人轮流为哑巴经会派烧茶役、背水役、清洁役等差役。土司被废除以后，经会会首由寺庙上级法座六名成员和四个保正共同研究提名，报请相子批准。

参加坐哑巴经的僧俗人等，隔一日吃一餐午饭，由哑巴经会首开支，计每人每次给酥油汤一瓢，人参果一瓢，油炸果子一盘

和部份奶渣等。这些食物在每天中午都必须给相子送呈一份。

（五）法会正式进行前的有关准备活动

根据“木郎”法会的规章规定，从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僧俗木郎德业都要集中在章古寺巴觉绕登大楼正式办公。

通知四位保正要指定专人，从当天开始催缴高利贷利息，摊派乌拉差役。同时，康团要通知所属洛五沟的两户差民，轮流来为木郎德业支差、磨粮食。茶溪卡、各他弄两村向法会上交柳条。

为祝福大祈祷法会能够圆满完成，按法会规章规定，木郎德业还须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后，要在泥巴沟“吾俄”护法神处和本寺的护法神“修登拉康”佛殿、国王“吾则拉康”佛殿、护法神“甲生拉康”佛殿为法会圆满完成念经祈祷。

同一天，还要在本寺释迦牟尼经堂请管理经堂的“阿本”和另请九个喇嘛，共十人，在经堂内为释迦牟尼佛象念一天观音经。给释迦牟尼佛象重涂金粉，敬献百灯、百供和点灯、献花，增献五色彩线，在观音佛象手持的钵内另换上新的青稞。

藏历正月初二、初三两日，按规定木郎德业要祭祀龙王。

正月初二至初七日，由大领经师带领两名领经师和四名助理，在密咒院楼上大厅内练习法会期间必须诵念的各种经文及其领诵方法、音调、姿态等。

正月初三，僧方木郎德业、相子、秘书和一名管事，两名内务助理，带上法会资金帐目和法会专用秤，去四大会首处核对结算帐目，并根据利息的多少，预算本次法会可能开支的茶叶和布施资金。

从正月初三开始，按规定来为法会服务的人员有：负责烧茶的扎巴二人，烧茶的俗人四人（其中二人称为“霍尔烧茶者，”过去是由土司派遣，以后改由相子指定），煮粥者四人，管瓢者

二人，管木桶者二人，上茶者十二人，背水者二十三人，背碱水者（距寺庙约一公里的山沟里，有一股含碱的水，用来烧茶，茶的颜色好）五人，打扫大殿者四人，铺陈黄毯香八人，维护环境卫生者一人。此外，木郎德业还要另雇木工一人，专负责在法会期间修理上茶的木桶等用具。

正月初四，以大经领经师、法相领经师二人为首，带领助手七人及前述有关服务人员，要到“尼巴康则”集中；测验经典的雄冷巴，带领参加测验的“呷举”到“西科康则”集中；为法会首席活佛服务的十人仪仗队，到“宜木康则”集中；铁棒喇嘛及其随从，在“斯木康则”集中。

正月初四和初五晚上，僧方木郎德业、相子、秘书等三人，要在巴觉绕登会议厅研究法会期间发放布施的具体安排事项。

正月初六，铁棒喇嘛助手要按例将大祈祷法会于正月初八日正式开始的通知，分分别告诉法会各有关组织及其负责人。

章古寺另有红教附属寺庙大小二十多处，分布在全县四个保正的管辖区内。每年正月初八法会开始时，红教各寺庙要轮流为当年的大祈祷法会祝福，祈求法会圆满完成。

（六）大祈祷法会的正式活动程序

一、一般活动程序

藏历正月初八，炉霍章古寺大祈祷法会正式开始。

当天早晨鸡叫头遍时，领经师助手一人，要到章古寺大殿楼顶，一边转金顶，一边大声朗诵“无缘大悲经”。天亮时，全寺扎巴、喇嘛要主动地集中到大殿内，在领经师助手带领下念诵经文。每念约二十分钟，即上茶一次，共念一小时左右，上茶三次，然后解散休息。

上午八时左右，由一名铁棒喇嘛助手，引来参加辩论的“呷举”们到讲经院石台阶上，在“雄冷巴”主持下，同法相院的喇

嘛、扎巴辩论经典。如果当年有从西藏回来的新格西，应当由铁棒喇嘛助手一人带领，由相子亲手为他们披上显示格西学位的黄披风（因在此之前，他们还同其它扎巴一样，披的是红披风），从此他们正式具有炉霍章古寺的格西地位。

上午十时以后，大、小铁棒喇嘛由铁棒喇嘛助手引路，去法会首席活佛住地迎接首席活佛。由铁棒喇嘛助手三人前面开道，其余的人依次排成三路纵队，其中第二排中间，是身着西藏四品官服的举香者，两旁是吹唢呐者；第三排中间，是首席活佛，两旁是大小铁棒喇嘛，在大小铁棒喇嘛的肩上，要扛首席活佛的法垫；第四排中间是打黄伞者，两旁是提金银香炉者；第五排是为首席活佛拿披风者，两旁是提“打雨”者；第六排中间，是用茶盘为首席活佛捧佛具的随从，两旁是广通经义者；再以后，即按“道行”深浅，威望高低，依次排列，尾随于后。

上午十一时，首席活佛开始讲经。先讲因果报应，然后讲“依仁经”《菩提道次第论》选段（是公元十四世纪宗喀巴的著作，有广、中、略三种版本，是格鲁巴派的主要理论著作），和宗喀巴关于释迦牟尼在公元前五一一年如何施展各种神变，战胜不利于佛教事业发展的各种外道等等。讲经结束，负责整理为死者请求超度名单的两名广通经义者，将请求超度的名单，送请首席活佛逐一过目。大约中午十二时左右，送首席活佛返回原住处休息。

首席活佛离开以后，铁棒喇嘛、领经师和全寺的喇嘛、扎巴，在三声海螺声中，按照正月初五安排好的坐次，进入大殿。在大会领经师主持下，诵经并上茶三次。在上第一次茶时，曾去西藏学经四年的呷举，要当众背诵经文；上第二次茶时，大铁棒喇嘛要念诵各位施主的求情信函（即宗教活动中皈依白书）；上第三次茶后，大会领经师带领助手，在一名铁棒喇嘛助手的护送下，离开大殿，返回住处；以雄冷巴为首参加辩论的呷举，由一名铁棒喇嘛助手护送返回住处。这时还要有一名铁棒喇

嘛助手，到巴觉绕登大楼会议厅门口，取下自己的袈裟，低头请僧方木郎德业、相子、秘书、内务助理二人去监督发放布施。僧方木郎德业站在大殿右侧，相子站在左侧，其他人分立两旁，因事未来参加念大经的做元宵供的十多人，密咒院念密咒经的十三人，以及首席活佛随从人员等，这时也要到大殿集中。然后全体喇嘛、扎巴、按资历从大殿门口鱼贯而出，依次发给布施。按规定可以不参加念大经的，如各大活佛、四大会首、六人会议成员、格西等等，可以派人前来领取各自应得的布施。在发完布施后，四个铁棒喇嘛助手可向僧方木郎德业、相子请求赏钱，然后，铁棒喇嘛助手护送木郎德业、相子一行回巴觉绕登大楼。

如果当天有临时上布施的施主请求首席活佛参加念大经，其迎送仪式同讲经时的仪式一样，寺庙的各个格西、喇嘛以及大活佛等有地位、平时不参加念大经的，都要前来参加。施主家的所有男性人丁，也都可以在阿本的带领下，盛装举香，进入大殿，绕行一周，并由施主家的喇嘛或父、兄等长辈，用茶盘捧“麦扎”，其他男性分别用茶盘捧佛像、经书、佛塔和其他多种物品，向首席活佛献礼。这些物品，只是在进行献礼仪式时使用，故一般是向木郎德业处租用，实际送给首席活佛念经的报酬，每次大约为藏洋四十元。如果这家上临时布施的施主同时又是法会资金的施主，则在向活佛献礼时，由木郎德业通过首席活佛，给他赠送一段五彩彩绦（约五尺），寺庙六人会议也要派代表一人，送给中等哈达一条，以示谢意。如果施主不邀请首席活佛念经，则按规定只由格西、喇嘛或其他活佛一人，领头为死者在念大经时超度。

下午二时左右，要在大殿念祈祷经。负责领经者是密咒院的领经师，念的经有“七支”（即敬礼支、供养支、忏悔支、随喜支、请转法轮支、请住世支、迴向支）、“请神去邪”等经，约于四时左右结束。

下午五时左右，全寺的“呷举”在听到第一声海螺声响后，

要全部到跳神院大殿的石台阶上集中；受过“具足戒”的喇嘛和其它喇嘛、扎巴、以及当天前来听经的俗人男女，也都可以到跳神院集中。在全体僧俗人等集中坐下之后，大、小铁棒喇嘛随即进入会场，这时，集中在台阶上的全部“呷举”，要起立向铁棒喇嘛低头致敬，大铁棒喇嘛则手持铁棒，盛气凌人地走来走去，并致训词。大意是：叙述释迦牟尼如何战胜了外道，发展了佛教；宗喀巴怎样为纪念这一胜利，为佛教的兴旺发达创办拉萨大祈祷法会；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又如何创建章古寺大祈祷法会，为炉霍僧俗百姓消灾免难，为众生造福，等等。最后，命令各有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照五世达赖为章古寺大祈祷法会制定的规则，各负其责；对违犯者，一定要处以金钱或肉体的惩罚，决不宽容。同时强调：一切违犯“法会”规则、有损“法会”的行为，就是冒犯神灵，必然要得恶果。训词结束后，呷举和受过具足戒的喇嘛，在听到第二声海螺声响后，即进入大殿。在跳神院内的其他扎巴，也要吼喊鸣叫地向大殿冲去，这时，四个铁棒喇嘛助手要负责阻拦，不准他们冲上台阶；大约持续十分分钟左右，在听到第三声海螺声响后，铁棒喇嘛助手佯装败退，扎巴们又高声呼喊，轰进大殿。据说，这是佛教战胜恶魔的一种演习。待全体扎巴进入大殿后，由领经师主持念诵经文。结束后，按前述程序再次发放一次布施。

晚上八时左右，在大殿正中，在“雄冷巴”的主持下，“呷举”们要参加同“法相院”辩论经典的仪式。除喇嘛、扎巴外、俗人中的男性可以自愿观看。四个管区的八名会首，要为辩论者上酥油茶。约十时左右结束。这时，附殿楼上要鸣锣，全寺喇嘛、扎巴在听到锣声后，都要到各自的平房顶上齐声诵经，由铁棒喇嘛助手和各管区的长者负责检查，大约半小时结束。

以上程序，从正月初九到十八，除铁棒喇嘛的训词外，其余讲经、念经、上、下午布施、以及晚上楼顶诵经等，都完全相同。

另外，从初八晚上开始，每天晚八时左右，六名烧茶者要在木郎德业外务助理的监督下，在大厨房内用大铜瓢将茶汁一瓢一瓢地从锅内滔出，倒进，并边滔边高声数数，连续数百次，直到管事通知可以停止时为止。然后加盖，由内务助理用合好的生面在茶锅上打好封印。这样做，据说，一是为了消毒，二是为了防盗。

从正月十二日开始，每天下午全体喇嘛念大经时，其中在西藏学经四年的呼毕、寺中曾担任过各种职务的长者，以及大祈禱法会的现职人员等三百多人，要由木郎德业按例向上述人员上油水（用酥油汤和开水各半合成）一次，并每天依坐次增加上油水的人数。到正月十八日下午“法会”程序结束前，凡到大殿念过大经的喇嘛、扎巴每人最少都能得到油水一次。其间，法会各个组织每天都可派人在上下午念经时，前来领取油茶（由少量酥油和茶汁合成）和油水共六次。

正月十四日，章古寺附属的红教各寺庙，要把算好的“春牛算”（仿照汉族阴历的春牛算法，在藏历中用以占卜年景收成的丰歉），派二、三人用哈达包好，送到法会木郎德业处，木郎德业对前来呈送“春牛算”的红教喇嘛，必须热情接待，并按法会《青则·洛桑克珠规则》，回送茶叶一甌、哈达一条，以及生、熟牛肉、油炸果子、人参果、酥油汤等。当晚，木郎德业要把“春牛算”张贴于木板上，交给煮粥者四人，负责于每天早晨挂到跳神院的大旗杆上，晚上收回。每天前来参加法会的僧、俗、男、女、对预报当年收成好坏的“春牛算”，都要争相观看，并且有很多人要记录下来，带回家里，告诉村邻。所以挂“春牛算”的地方，每年都很自然地成为法会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在法会期间，每次在念大经以后，负责打扫大殿卫生的阿本，都要将扫下的垃圾，交到木郎德业处由管事收藏，以防止大殿的垃圾被人取去充作念咒经时的被咒物。这些垃圾在法会结束时，除少量可作拌种使用（据说经过这样拌种后，可以得到

丰收)外,绝大部份由管事监督负责打扫卫生者,背去倒在鲜水河里。

二、元宵供活动程序

元宵供传说起源于公元一四〇九年,是黄教祖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创办大祈祷法会时,于藏历正月十五日夜,陈列用酥油做的供品,以纪念释迦牟尼显示神变、降伏邪魔的宗教纪念活动。为此,炉霍章古寺于每年法会期间,也要举行元宵供活动。

为了给元宵供活动做好充分准备,从头年藏历十二月十五日起,木郎德业就要派遣十一个人为元宵供进行有关准备。制做各种供物,修整陈列供物的木架等,并要在正月十五日凌晨为元宵供举行开光仪式前,一切陈设就绪。铁棒喇嘛助手,要于正月十三日发出通知,邀请法会首席活佛和有关组织成员,届时参加为元宵供准备的开光仪式。康团的甲长,要在为元宵供举行开光仪式期间,负责前来维持秩序。

十五日晨六时,铁棒喇嘛助手一人,要首先去请木郎德业全体成员,前往朝拜元宵供。拜毕,全寺各经堂一齐开放。这时,全部僧俗男女都可各自带上香、灯、哈达、青保等敬神物品,去向元宵供神架叩头礼拜。

中午一时左右,在阿本指挥下,正式为元宵供举行开光仪式。为此,事前需在讲经院台阶顶端设置坐台,铺陈藏毯,按职务、资历、僧、俗、男、女顺序划分好坐次。为元宵供开光者,按规定应是首席活佛。但首席活佛一般都不亲来参加,而是派一名格西或喇戈作为自己的代表,穿上首席活佛的全套法衣、袈裟,戴上丝质的头披“当让”,前来坐台打坐。全寺其它的格西、喇戈、雄冷巴以及当年从西藏回来并参加辩论经典的呬举们,也都要按具足戒规穿上法衣、袈裟,分别坐在首席活佛坐台下面的台阶上。全体入坐以后,法会的三个大领经师和七个领经师助手,要穿着有厚肩垫的锦缎喇嘛上衣用一百幅红毡毯特制的披风,盛装慢步入场就坐,在每个领经师面前,还要呈放一付寺

庙非常珍贵的、用黄缎包裹着的佛具——钹。密咒院的十三名密咒者，也要穿戴整齐，负责为开光仪式吹奏唢呐、海螺、莽筒、敲打铜锣等。泥巴沟有个萨迦派的小寺庙——牛吉寺，过去曾为炉霍土司念经祈祷，因此，土司在世时，要特邀该寺十个喇嘛参加法会，并委派他们在元霄供开光仪式上负责击鼓。击鼓时，领头者在面前用木架悬挂一面大鼓，其余九人自拿手鼓。开光仪式开始时，首席活佛代表撞响碰铃，大殿两侧同时点香熏烟，密咒院领经师边拍钹、边领经，全体扎巴、喇嘛随声附和，顿时鼓乐齐鸣，香烟燎绕，僧俗男女同时向元霄供叩头、撒青稞，祈求吉祥。约两小时，开光仪式结束，铁棒喇嘛助手护送首席活佛代表和其他各有关组织负责人返回住地，然后僧俗男女依次退出会场。两名阿本负责指挥和维持会场秩序。

元霄供按规定陈列一昼夜，十五日晚天黑以后开始拆除，在第二天凌晨前必须拆除完毕。

三、护法神降神仪式

十五日晨，当首席活佛在讲经院例行讲经时。僧方木郎德业或相子中一人，要带上香、净茶、金钢结、长腰刀，去护法神勒穷其雄的降神人家里将其请出。先为降神人穿好神衣，佩戴好弓箭、长刀、旗幡、彩绦等，并将其迎上释迦牟尼经堂为他设置的坐台上。平时在护法神经堂负责念经、敬神的十名喇嘛，这时，要边念经熏香，边鸣锣击鼓，降神人开始“发神”（宗教上说是神灵附在了降神人身上）。受僧方木郎德业和相子跪拜，然后降神人要向首席活佛献彩绦，首席活佛则向降神人献哈达。降神人并即舞刀、射箭，然后跑步到大殿左侧“此乃甲波”（善业法王）画像前，向早已准备好的坐台扑去，作昏倒状。神灵就离开了降神人的躯壳。至此，法会期间第一次降神仪式宣告结束。

四、为炉霍土司布施、超度的活动程序

正月十五上午大经散会时，是木郎德业专为历代炉霍土司进行超度并发放布施的时间。为了作好这项活动的有关准备，十四

日就要将四个管区内应得布施者的名单，每人发给一张盖有本郎得业公章的纸条，以便第二天按纸条发放布施。这次布施因是为炉霍历代土司及其家属和头人进行超度，所以比一般发放布施的数额要多一些。这项活动，按规定还应邀请首席活佛、寺庙坐台喇嘛前来参加发放布施的献礼仪式。

仪式开始，相子要身着官服，手捧用哈达包好的经书、佛像、经塔和历代土司及其亲属、头人的名单；康团差民中，每户出一人盛装手捧虎、豹等各类兽皮、丝绸、锦缎、布匹、毛呢等，由相子带领，排列在大殿首席活佛坐台面前，由坐台喇嘛到大殿正中面向首席活佛致献礼词。大意是请求以首席活佛为首的全寺喇嘛、扎巴、为历代炉霍土司等人的亡魂超度，致词毕，由相子领头，先向首席活佛献上经书、佛像、经塔和请求超度者的名单，首席活佛将上述礼品、名单接过，一一在自己头上顶膜致意，除名单外，都原封退还给相子，并亲手赠送相子上等哈达一条，红绸金钢结一个。然后其它人手捧礼品，依次从首席活佛面前走过，请首席活佛过目。首席活佛向每人赠送红绸金钢结一个。相子等人献礼毕，退出会场后，首席活佛当众念超度名单，并带领众僧为死者念超度经。

五、立誓会活动程序

立誓会，据说是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大祈祷法会期间，由哲蚌寺十九名喇嘛担负铁棒喇嘛助手，他们借此吸烟、赌博、乱搞女人、留耳发、酗酒、乱打人等等，违犯了教规，大铁棒喇嘛要当众训斥他们为“巴戈”（即和女人乱搞过的人），并在指出他们违犯教规的事实后，命令他们立誓悔过。章古寺大祈祷法会沿照拉萨大祈祷法会旧例，也进行这项活动，但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一是铁棒喇嘛借此显示威风，念经祈求神灵保佑；二是把大铁棒喇嘛的训斥改为在正月初二日由呷举扎仓的一名总管同四名铁棒喇嘛助手进行个别谈话，教育他们在法会期间，要按《规则》办事，遵守教规，负起责来。

六、为参与辩经获胜者举行的发奖仪式

藏历正月十八日晚约六时左右，雄冷巴要带领当年从西藏学经归来的呬举到讲经院参加为辩经获胜者举行的发奖仪式。这项仪式，全寺喇嘛、扎巴和俗人男女都可参加。三个领经师和领经师助手七人以及寺庙的全体格西、喇戈等，可以坐在台阶上观看。

仪式开始，先由雄冷巴主持，作一小段辩论经义的表演，然后由一名铁棒喇嘛助手邀请木郎德业、相子来到会场。在这次发奖仪式上，相子要头戴插有花羽、玛瑙、金质帽顶的蒙古族黑獭皮大盘帽，身穿黄缎镶有水獭皮边和织有文纹、岩石、彩云、龙的“四相”彩缎龙袍，腰佩嵌有珠宝的长腰刀和一些金质装饰品，项上戴两串珊瑚、玛瑙链，右耳戴一支金质的长耳坠，脚穿金绒蒙古靴，由两名仆从手捧彩绶、哈达跟随身后。首席活佛和寺庙十六人会议厅也各派代表一名，随带一名仆从，手捧哈达，紧跟身后。当相子一行来到台阶前时，雄冷巴要起身命令停止辩论，并向相子将应获奖者的名次，一一介绍。获奖分为三等，每等各为数人。相子首先给获第一等奖的代表戴上长哈达，然后依次给获二等奖的代表戴上中等哈达，给获三等奖的代表戴上短哈达。再由各代表分别为获得同等奖的“呬举”戴上应得的哈达。发奖结束后，以三位领经师为首和坐在台阶上的各有关人员，起立念吉祥经，并同时抛撒麦粒，祈求吉祥如意，然后离开会场。在场的喇嘛、扎巴，这时可以自愿三五成群地在场内互相拥挤碰撞，并大声吼叫、奔跑，以示狂欢。直到傍晚，由铁棒喇嘛助手向大家弯腰低头，请求停止、始行解散。

在进行上述仪式前，法会选定有负责敬神丸药水者四人，要事先在大殿楼上观看僧俗人等进入会场的盛况，木郎德业要为此四人设置茶点招待。全寺喇嘛、扎巴、在进入大殿并入坐以后，四名敬神丸药水者即从四名随员手中将丸药水壶拿上，进入大殿，向全体喇嘛、扎巴、敬神丸药水。当相子在为辩经获胜的呬举们发奖时，四人又要到台阶前为全体参加辩经者每人敬一碗

酥油茶，以示祝贺。

七、降巴佛迎神会程序

藏历正月十九日上午，是法会降巴佛迎神会仪式。这项仪式，在拉萨大昭寺是正月二十五日举行，主要是祝愿弥勒佛为众生化度的时刻能够早日到来，并将大昭寺内的银质弥勒佛像抬出，在八角街环行一周，接受信徒的朝拜。因炉霍章古寺法会是定于十九日下午结束，因此，这一仪式也提前于十九日上午举行。并在正月十七日，铁棒喇嘛助手就要负责向法会各有关组织及成员发出通知，以便各有关人员按时前来参加。

章古寺的弥勒佛像，是炉霍土司正吉·德瓦夏巴在西藏时经所拜主师四世班禅登比尼马所赠，由生黄铜铸成，甚受炉霍土司喜爱，并为此在章古寺大殿顶上专修了一所精致的佛堂供奉，佛堂右侧，绘有描述班禅赠送佛像情景的大幅壁画，还有详尽的文字记载，寺庙一直把这座传说能开口讲话的佛像视为珍宝。

参加迎神会的仪仗队有三百多人，有黄伞、旗幡、彩旗、全套乐队等。上述人员的服装，完全按拉萨大昭寺法会议仗队服装制作。上午六时左右，由八人抬着弥勒佛像在前面开道，紧接抬着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披风，后面抬着据说有光明佛留在两条黄哈达上的脚印等等。首席活佛的代表、法相院的领经师、七个领经师的助手、护法神的降神人，以及当年从西藏学经归来的呷举等人，尾随在后，鸣锣击鼓、举香熏烟、浩浩荡荡地围寺按白粉划定的路线绕行一周，并在寺庙四方，各停留片刻，为佛像念一遍清邪经，允许部份人向佛像顶礼膜拜。

在迎神队伍到达寺庙东门停留，接受木郎德业全体人员和首席活佛代表等朝拜佛像以后，还要将佛像抬到跳神院早已准备好的高脚木架上，让僧俗男女从佛像下穿过，进行朝拜。四名敬神丸药水者，在木架出口处向人们手心上倾倒神丸药水。弥勒佛像在跳神院停留期间，仪仗队要排列四方，鸣锣击鼓，鼓乐宣天。朝拜毕，仪仗队送佛像到大殿前，然后自行解散，由当年从西藏

回来受过具足戒的八人将佛像抬回佛堂安放。到此，降巴佛迎神会仪式结束。

一般说来，参加迎神会的僧俗男女是法会期间人数最多的一次，每户除留一人看门外，全家都要穿着节日盛装随仪仗队绕行一周。当僧俗男女在跳神院朝拜佛像期间，四个铁棒喇嘛助手要和分管弥勒佛堂的两名管理人员，盛装和手持皮鞭，负责维护会场秩序。

（七）大祈祷法会的结束仪式

藏历正月十九日下午，是炉霍章古寺大祈祷法会的结束仪式，也是法会期间最隆重的一次盛大集会，称为“驱魔”盛会。根据是：在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在藏历正月二十四日大召寺法会结束时，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送鬼仪式。这次集会，实际上也是三大领主企图以宗教形式显示自己的威仪，对有迷信思想的群众进行威慑的大型活动。章古寺沿袭此例，只是提前于正月十九日下午举行。

为能认真组织好这场结束盛会，同样起到显示威仪、慑服群众的作用，章古寺法会各有关组织，事先要作好各项有关准备。

一、正月十二日，僧方术郎德业、相子、秘书等人，要研究确定祖辈曾在炉霍土司在世时任过“大汗”（古代蒙古官职名）职务的二十二人，分别在法会结束仪式上担任有关职务。计有：敬神丸药水者四人；扮演古装蒙古骑兵副元帅“亚索”的六人，其中二人负责“黑旗”前导，四人担任鸣火枪手指挥；十二人扮演“黑旗官”，具体指挥由三十六人高擎的十二面黑旗队伍。

二、正月十四日，大小铁棒喇嘛和三个领经师，要在铁棒喇嘛住处研究参加法会结束仪式驱魔时的僧众仪仗行列及其有关人员名单。计有：吹莽筒（包括提莽筒者）、唢呐、海螺、人骨号和拍钹、鸣锣、击鼓者；提金、银质各种香炉者；举各色伞、幢、

旗幡者，捧各类供品、佛具、食物者，共约三百人左右。名单确定后，由密咒院领经师于十六日下午在大殿当众宣布，对担任击鼓者，由佛堂管理人员当众发给鼓锤；其他人于十九日中午到大殿集中，由阿本按名单发给各人所特用的物品。

三、在元宵供活动结束后，负责为元宵供进行准备的全体人员，要立即转向为这次结束仪式进行准备。主要是用糌粑塑成一具高三米、称作“朵玛”的人体形像：上半身用人尸骨架，并在骷髅头上装一对能够转动的眼睛，下半身支撑在红底、黑边、画有眼睛、嘴巴的三角形木片插立的糌粑上，头顶撑一把布质黑伞，颈项上挂一圈吹胀了的牛肠子，周围放置各类食品。“朵玛”塑成后，于十九日凌晨供放在大殿左侧，铺有红土的圆木板上，用布帘围罩，然后由密咒院领经师带领十三名密咒者为之念经，一直念到天色大亮为止。在念经期间，木郎德业要为他们敬三次油茶。

四、十九日上午降巴迎神会结束后，立即由阿本二人带领煮粥者四人以及服务人员等，先后到就神院和离章古寺约五华里的龙仁溪卡大地里，为参加法会结束仪式的有关组织、人员划分坐次，为木郎德业磨粮食的差民二人，这时必须背碗豆秸和木杆各一背，在指定地点架设“朵玛”棚（用木杆搭成约高三米、宽二米五、上面盖以碗豆秸的临时草棚）。

五、十九日上午，根据木郎德业通知，当值支驿站差的保正，要负责担任法会结束仪式期间鸣火枪手的头领。负责支应马差的差民，每户要来一人充当鸣火枪手；支牛差、人役的，要为法会充当杂役，如举黑旗，为亚索牵马、放礼炮等等。以上共约二百五十人左右。

以上人员，都要按规定穿戴。亚索的装束是：头戴长辫假发，上佩金、银镶嵌的珠宝头饰，辫梢用阿西哈达缠于腰间；戴珊瑚渡金、插有长羽的蒙古獭皮大盘帽；右耳戴金质长耳坠，身穿红缎皮袍，上套黄缎镶有獭皮的马褂，佩长腰刀，金银质腰饰；脚蹬

金绒蒙古靴。

两名亚索次巴（元帅）的装束，与一般亚索大致相同。其不同点是：戴金质水晶顶帽，佩戴朝珠，穿团龙缎袍，袍、褂都镶獭皮边。

十二名黑旗官的装束是：头戴长辫假发和黑皮带穗的桶形帽，身穿红藏片獭皮边皮袍，佩长腰刀，脚蹬金绒蒙古靴，手持镶有铜质花纹特制的皮鞭。

军旗手二人的装束是：头戴狐皮，上身穿红藏绸上衣，黄色甲子呢双金边坎肩，毡毡长袍脱袖一支，白藏绸裤，毡毡藏靴，手举红缎彩虹边有飘带的军旗。

礼炮手二人，其装束是：头戴红藏绸大头巾，身穿红藏片豹皮边皮袍，双袖缠腰，上身穿红藏绸汗衣，白藏绸裤，普通藏靴，手持系有引火线的柏木棍。

鸣火枪头领的装束是：头戴用牛尾做的长辫假发，发辫上就有金、银质镶嵌的珠宝头饰和斑指，左耳戴金质长耳坠，身穿獭皮边皮袍，上套鹿皮豹边单衣，穿红白相间的藏绸裤，扎脚带后裤子要拖到鞋尖，脚穿蒙古骑士靴，腰插嵌有三颗珊瑚珠的银质长腰刀，右边佩长剑，左边佩弓箭，上身穿红藏绸大袖汗衣，外套黄团龙缎、双金边坎肩，佩金、银质嵌有珊瑚、松耳石的护身佛盒、盒带上系彩绦，右手大拇指戴牙骨斑指。头领专用的鸣火枪多装三倍火药，称为“藏扎”，是响声能震动世界之意。由随从负责背扛。

鸣火枪手要装扮成古代藏族枪手的形象。其装束是：头戴长辫假发，身穿红藏片獭皮边皮袍，红白相间藏绸大裤，脚穿红藏片古装藏靴，肩扛用白铜饰的长叉鸣火枪，枪柄上有用红、绿藏片在红黑牛皮上装饰古代花纹的引火线包，腰佩用白铜装饰的兽角尖火药筒。

以上人员，要于十九日上午穿戴整齐，到木郎德业早已为之准备好的法相院集中，其中亚索等六人，要给设置坐台，十二名

黑旗官要给铺设藏毯，并配置酒、肉等各类食物，驿站还要派专人为之服务。

僧方参加结束仪式的人员和装束，分别是：

吹莽筒和提香炉者，身穿厚垫肩的金丝缎喇嘛坎肩，上等喇嘛裙子、袈裟、黄色鸡冠形帽，腰前系净瓶套；提香炉者，还要在左肩上横披一条五尺长、二尺宽的金丝缎。捧供品、食物者，身着全套喇嘛衣裙、法衣等具足戒服装。

三名领经师和七名领经师助手，除身穿厚垫肩金丝缎喇嘛坎肩和全套喇嘛衣裙外，还要披黄缎法衣，红毯毯披风，头戴鸡冠形黄帽，腰前系净瓶套等。

十三名密咒者要身穿全套喇嘛衣裙，披法衣和红毯毯披风，大部份手持铜钹，少数人拿手鼓，在密咒院领经师带领下，负责在结束仪式抛“朵玛”（驱魔）时念经。

负责主持“驱魔”仪式的此巴喇嘛，身着全套活佛装束，披用上等黄缎做成的披风，用红金丝缎袈裟黑獭皮细边的领条，穿正中嵌有一小块方形黑缎的背心；戴与黄色鸡冠形帽基本相同的堪布帽；并左手拿金钢杵，右手持铃。

另有二十多人，装扮成各种神象，如六臂护法神，二臂威德神，金刚手等等。

十九日中午，当大殿楼顶吹响第一声莽筒时，参加僧众仪仗行列的人员，要按照规定，穿戴整齐，到大殿集中，俗方的两名“亚索”和十二名黑旗官，也要到大殿集中；由阿本二人负责整理队伍。

当吹响第二声莽筒时，在十二名黑旗官的指挥下，首先由十二面黑旗先行开路；然后在阿本指挥下，僧众仪仗行列随行；其中，三名领经师和七名领经师助手，在仪仗队右侧边走边舞，同时，鼓乐喧天，莽筒声阵阵。在仪仗队伍中间，由两名吹唢呐者作前导，相子举香为此巴喇嘛引路；此巴喇嘛边走边挥动系有黑绦的金钢杵，摇着铃，走到划有方形图正中自己的位置上站定。仪仗队

伍的最后是“朵玛”，即为这次结束仪式所驱之魔，将它抬到次巴喇嘛对面划有三角形的“行空”内。

当第三声莽筒吹响时，在法相院的两名“亚索次巴”和两名铁棒喇嘛助手，分两路带领鸣火枪手头领和枪手们，从左右绕场一周，到黑旗队伍后排列。密咒院领经师在场内边念经、边舞蹈，大约一小时，由黑旗领头从跳神院出发，走寺庙“金甲”大门（寺庙四大门之一），经龙仁溪卡，至“朵玛”棚。当黑旗走出“金甲”大门时，炮手边舞蹈，边点燃导火线，放第一声礼炮。抬“朵玛”出大门时，放第二声礼炮。护法神发神人及其随从、乐队、彩旗、香炉手等一行人到大门口时，放第三声礼炮。

当驱魔队伍到达“几尼”（寺庙四大门之一）院坝时，院中事先设置有一个用篾篓装灰的枪靶，明火枪手围绕“靶场”站定，其余队伍继续前进，僧俗人等围观打靶。这时，枪手头领耀武扬威地站到离靶场约四米的地方，持枪随从低头弯腰，将鸣火枪举交头领，头领先将枪带缠在左手上，顺手将枪接过，右手接过随从已经点燃的导火线，轻轻抖动三下，将导火线夹在枪栓中间，对准靶场放第一枪。据说，第一枪响声如何，象征着当年全县僧俗的祸福，因此，对放响第一枪都十分关注，围观者也特别多。当头领放过第一枪后，其余枪手，以每二人为一组，跑步快速对准靶场放枪，如果谁的枪没有放响，要当场受到观众的嘲笑。枪手们轮流打靶完毕，在头带领下，赶上驱魔队伍。

按照规定，三名领经师和两名铁棒喇嘛，在明火枪手打靶结束后，可在设有茶点的路边小屋内休息，不去驱魔地点。六名亚索和十二名黑旗官，在到达一个能够看见驱魔地的小山坡时，可以停止前进。其余僧俗人等在到达驱魔地后，各按划定地点排列，重复一遍前在跳神院的仪式，由密咒院领经师助手一人，代理领经师进行念经、午蹈。相子举香将此巴喇嘛引至“朵玛”棚前，在密咒者念经告一段落后，此巴喇嘛将“朵玛”推倒，并在柴火堆上抛出“驱魔食子”，以示驱除邪魔。原搭柴草棚的差

民，负责点燃柴火架。

在法会结束仪式上，护法神勒穷其雄要再次发神。这降神人所穿的装束，基本上与十五日在元宵供发神时一样，但衣服成色、佛具质量应当更好一些。当次巴喇嘛将“朵玛”推倒，差民将柴草棚点燃时，降神人即跑去向“朵玛”连射数箭后昏睡。在降神人苏醒后，要身着全套活佛装束，即头戴黑狐边黄缎帽，穿喇嘛衣裙，外套黄团龙缎长马褂。木郎德业要事先为降神人准备一匹好马，装备金顶、金鞍，并在金鞍两边垂吊各色丝穗，呈列用锦缎制成的“轮王七宝”（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白象宝、紺马宝和将军宝）饰品。

在次巴喇嘛将“朵玛”推倒，差民将草棚点燃，降神人向“朵玛”射箭之后，鸣火枪头领要大吼一声举剑冲向“朵玛”，挥刀数下，抢手们对准“朵玛”，齐声放枪。至此，驱魔结束，仪仗队伍依次返回。

在仪式结束返回时，相子和六名亚索可以乘马直到“金甲”大门。他们乘马的装饰是：蒙古式金鞍，铺上等藏毯鞍垫，坠各色丝穗，马蹬带用阿西哈达包缠。相子和两名亚索次巴的马颈上，还要装配显示官职的马缨套（相子装备二个，亚索次巴各装备一个）。相子和亚索次巴并各有两名牵马人（用阿西哈达左右牵着）；四名亚索各有一名牵马人，从右边牵着。牵马人的衣着，必须整洁，以显示威仪。

护法神降神人也可骑马返回，并另配一马，为降神人驮运神衣、用具等。

队伍回到“金甲”大门院坝以后，由阿本再次整顿队伍。这时，六名亚索和十二名黑旗官，要先到跳神院列队在大殿前面，向大殿楼上炉霍土司的寝宫，恭恭敬敬地脱帽行鞠躬礼。仪仗队伍整顿好，进入跳神院，排列整齐以后，抢手们分两路从两边各绕场一周，然后返回住地。这时，大殿两侧要点火熏烟，由密咒院领经师领颂经文。毕，在三名铁棒喇嘛助手带领下，分三路进

入大殿，随即解散。

与此同时，大殿楼上要吹响海螺，全体喇嘛、扎巴、要主动进入大殿念“吉祥经”，由大领经师派一名代表负责领经，这次念经，同其它念经时一样，要上茶三次。木郎德业成员向参加念经者每人献哈达一条。至此，一年一度的炉霍章古寺大祈祷法会，正式宣告结束。

一九八三年五月

石渠县温波喇嘛寺叛乱经过

上 燕

石渠县温波喇嘛寺建寺于公元一千七百〇九年，属喇嘛教中的格鲁巴（黄教）派，是石渠县扎斯、扎尼两乡群众比较信仰的一所寺庙，在康区黄教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全寺解放前最盛时期，约有喇嘛、扎巴三百多人，主持人为历代的江鸠活佛。我于一九四二年（八岁）被送入该寺为活佛。一九五三年，又被决定为该寺的堪布，主管该寺宗教戒律和寺庙管理等全面工作。

一九五六年春，党和政府为了藏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劳动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各县实行民主改革，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事前曾开过省、州的人民代表和政协会议，讨论协商通过，我在县上也听到过传达。但由于我当时觉悟很低，对民主改革的性质、意义没有认识，以致在谣言蛊惑、宗教愚弄、民族煽动和其它各方面压力等影响下，配合地方的反动僧俗上层，参加了以阻挠民主改革，反对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维护反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结果，不仅破坏了藏、汉民族和本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造成了当地人民和寺庙僧俗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违反了佛门最根本的教义——“不准伤生害命”的宗教法规。这是我一生背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对党对人民，同时也是对宗教犯下的一次极其严重的罪行。现将我参加和组织策划石渠县温波喇嘛寺武装叛乱的经过，简述如下：

一九五六年春，民主改革在全州范围内蓬勃开展，西藏地方

政府中的个别反动上层，勾结我州个别反动分子，四出串联，组织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事前，他们就四处游说，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要通过民主改革，消灭寺庙和宗教，没收私人财产。对喇嘛、活佛、土司、头人都要斗争、杀死”等等。听了这些谣言，我感到十分恐惧和惊慌。联想到我住持的温波喇嘛寺内除供有五世达赖罗绒嘉措亲自发给的七个观音菩萨和一杆旗子、一颗印章而外，还供有一世江鸠喇嘛和二世江鸠活佛圆寂后，用他们的骨灰塑造的四尊佛像，这些菩萨和佛像，我认为真神的化身，是极为尊贵的圣物。它不仅给寺庙赋予很高的声誉，而且主宰着扎斯、扎尼两乡男女老幼的生死祸福，如果共产党毁了寺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因此，一定要拚死保护。同时康区和西藏地区有的县已经开始叛乱，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煽动要“同生共死”，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压力，思想上动荡不安。但因当时民主改革还没有在石渠县进行，温波喇嘛寺也就处于“静以待动”的状态。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石渠县派民政工作队到了扎斯乡，并派原扎斯乡头人泽渣（解放后参加工作，在石渠县人民政府任职，一九六〇年因病去世）给我带信，要我支持收缴扎斯、扎尼两乡散存在群众和温波喇嘛寺的枪枝、弹药。他还告诉我，扎斯乡的枪弹准备全部集中上交，扎尼乡和温波寺的枪弹，也望能如数上交，请我和扎尼乡僧俗上层人士，用实际行动支持民主改革的进行。接信后，我随即召集扎尼乡和温波寺较有声望的僧俗人士研究对策。商定：枪弹不能全部集中上交，全交了就会失掉保护宗教和寺庙的自卫力量。但不交也不行，为了应付工作组，决定只交少数霁枪。当晚，我派人挑选了十几枝坏枪送去工作组，子弹则一发未交。

第二天，我们的邻乡长须干马的头人藏中，派专人来和我联系，说：藏中准备叛乱，已经同青海果洛地区的头人联系好了。问我是否参加叛乱，并威胁说：如决定叛乱，就和他们生死与

共，如不叛乱，他们就要把我们当作共产党一样加以消灭。

这时，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主要是考虑着几个问题。一是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很不了解，而对前一时期听到的“共产党通过民主改革要消灭宗教”的谣言，则信得较多。第二，我是主持温波寺有实权的堪布，寺庙联系我一生的命运，如果寺庙被毁，我就会失掉宗教上的一切特权。第三、长须干马的土司、头人，其势力比我们大得多，如果他们真要把我们当作共产党来消灭，我们是无力抵抗的。基于这样几种考虑，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决定参加叛乱。并将这一决定，分别转告给在当地僧俗中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人，征求意见，取得同意，并积极筹划叛乱活动。

与此同时，泽渣又来信向我交代政策，对我准备参加叛乱的行为进行劝阻。指出：“党和人民政府对参加叛乱和不参加叛乱的政策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在对待上也是有根本区别的。如真要参加叛乱、肯定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同时指出：“如果不听劝阻，扎斯乡的广大群众和扎斯乡住温波寺的喇嘛、扎巴，都不会伙同你和扎尼乡的少数人参加叛乱，”并要我考虑后果。按理，我对老友泽渣的忠告应该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扎斯、扎尼两乡在世代交往中，都是极为友好的。据传说：在五世达赖罗布嘉措掌权的时代，有一个叫洛让曲批的学者，编写了一部叫桑曲扎西却几娃的经书（是供群众熏烟时念诵的经书），受到了五世达赖的嘉许，并赐给他七个观音和一杆旗子、一个印章，于是，洛让曲批带了七家人定居在石渠县雅鲁江两岸，把旗子给了左岸，即现在的扎尼乡；把印章给了右岸，即现在的扎斯乡，掌管旗子和印章的两户，即定为两乡世代的头人。这种历史渊源，使两乡群众长期以来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因我当时参加叛乱的决心已下，丝毫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他的忠告极为抵触，还进一步开始了我组织策划叛乱的活动。

六月四日，我和扎尼乡代理头人益呷，召集所属小头人，亲信和决定参加叛乱的骨干分子切乌尼多，阿拉泽仁、朱虚阿洛、

约墨鲁那等六人开会，决定叛乱分两部份进行。

第一部份，由益呷、切乌尼多、阿拉泽仁、朱虚阿洛等四人负责组织叛乱队伍。规定：一、集中两个乡所有能够参加打仗的男子参加叛乱，不到者每人每天罚牛一头；二、弄清有枪有马、有枪无马、有马无枪的户数，其中除已被编入叛乱队伍的以外，根据有枪出枪，有马出马的原则，集中枪马供没有枪马的青壮年使用，总计集中叛众二百多人，枪三十多支，子弹三千五百余发，马一百多匹，编成了八个小组，无枪枝人员，则以藏刀作为参战武器；三、没有参加队伍的人户，要分摊口粮、酥油、牛、羊肉、奶渣等，以供参加叛乱的青壮年食用；四、不分性别、长幼、僧俗和贫富、贵贱，都必须服从我们统一的指挥，任何人不得违抗，不得有任何特殊；五、加强站岗巡逻，加强情况联络，随时准备战斗。

另一部份，也是叛乱的主要部份和精神支柱，是通过宗教形式，为参叛人员进行祈祷。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主张进行民主改革的藏，汉族干部、群众念经诅咒。全面叛乱工作由我负责策划指挥，念咒经和进行祈祷，由我亲自来抓。会后，又派人去和长须干马、长沙干马等乡的头人联系，约定共同参加叛乱和叛乱以后的协议条款，和相互支援办法等等。

按照宗教规定：寺庙念咒经应该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也要有一定的念词和咒语。通过念咒经，一般可以起到利用群众对宗教的信仰，煽动群众中的民族和宗教情绪，进而相信神会保护我们获取胜利，使解放军不战自溃，民主改革会自行停止，封建农奴制度从此得以维护，并可借此坚定群众的叛乱信心这样多种目的。但念咒经是要增加群众负担的，如在念经期间，敬神的全部供品和捏造鬼神、俑体需用的酥油、糌粑，以及参加念经的喇嘛，扎巴需要的优厚生活供应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念一次咒经，就需要耗费扎斯、扎尼两乡群众一年所得的全部收入。但我为了煽动和迷惑群众，根本不考虑群众的生活和经济负担，决定

从六月七日开始，分几次进行念咒经活动。第一次集中一百五十多人念咒经三天，由我先派人挖了一个三角形的土坑，用酥油、糌粑捏好许多人形，并在其心脏部位写上党中央最高领导以及我们觉得需要咀咒的人的名字，由我主持作法和念经，于六月九日将人形装进牛角，埋入土坑。

七月二十三日，解放军骑兵一部被我伏击，双方互有伤亡。我们认为这是菩萨给我们显示了力量。因而于八月十五日，又第二次念咒经三天，这次念经还结合温波寺“灌顶”的宗教节日，因此规模更大，除召集扎斯、扎尼两乡群众外，又吸收了其它地方窜来我寺的一些叛乱分子，共达五百多人。这是我们从叛乱以来集结群众最多的一次。念经期间，我对我部和流窜前来的参叛人员，进一步提出了四点要求：1、提高警惕，加强站岗放哨和互通情报；2、团结对“敌”，不得互相倾轧；3、言行一致，同生共死；4、对以上有违犯的，要驱逐出境。这次集会，对扩大叛乱声势，为叛众撑腰打气，防止内部分裂，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们又一次抢劫了解放军的粮食和军用物资十二驮。年底德格邪清、若靖等地的叛众四十多名也窜来我寺，其中还有几个较有声望的宗教界人士，为了壮大声势扩大影响，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又念了第三次咒经。这次念经期间，同德格邪清寺活佛然尽，若靖寺堪布俄之等叛乱骨干定了两条协议：1、加强联系，统一步调，生死相依；2 念咒经的活动还要继续进行，并由然尽活佛具体指导我们的祈祷和念咒经活动。

二 就在我们异想天开，不断愚弄麻痹群众，同时又四处危害群众的同时，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六日傍晚，解放军突然包围了我们的寺庙，向我们进行了宣传、喊话等政治攻势。十七日和十八日白天，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这时已有大部份参叛人员，自愿放下武器，离开寺庙，受到解放军的安抚，

安全返家。十八日晚，解放军发起了强攻，占领了寺庙的大部地方，我们约二十多人据守大殿继续顽抗，直至十九日傍晚，解放军再次喊话，我们也弹尽粮绝，全部被俘。

被俘以后，公安机关对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审查和教育。在关押期间，对我触动最大的是，我生过两次危重疾病，但管教人员对我并无任何歧视，而是给我以精心治疗，从死亡线上把我解救过来，使我获得了再次生命。

一九七九年四月，我和同时被俘的扎尼乡小头人阿拉次村等以及在民主改革中其它地区参叛的人员，全部被宽大释放。还把我安置在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为委员，其余人员也都得到妥善的安置。我还先后两次回家探亲，一次去北京、成都等地参观。在回家探亲期间，看到我原来住持的寺庙，除在叛乱中被双方战火所破坏的以外，其余均保存完好；群众信仰宗教，享有充分的自由。通过民主改革，解除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各种乌拉差役，现在精神面貌和生产情绪都很振奋，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我所熟悉的一些没有参加叛乱的人员，已去世的，在他们生前和死后，都得到政府各方面的照顾，未去世的，有的仍然在政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有的欢度着晚年生活。和我一起参叛的人员则有的死亡，有的伤残，看到这些情况，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愧恨，深感自己没有听共产党的话，没有听老友的劝告以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北京和成都等地参观期间，我们先后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朝拜了峨眉山等佛教圣地，浏览了祖国部份地方的大好河山，见识到祖国的伟大，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为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抚今思昔，使我深深感到：是过去的封建思想和落后意识，使我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以致走上历史的反面，一害了社会，二害了别人，同时也害了自己，是共产党把我从迷途中解救了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

自己的世界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一个真正爱国的宗教信徒。

（来作中、邓俊康整理）

一九八〇年八月

对《西康解放前后》一文的订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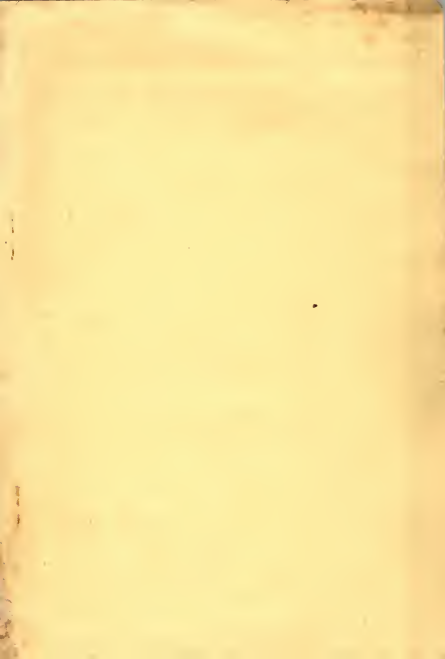
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西康解放前后》一文中谈到伪西康省康定政务委员会的建制时，有“冯有志（原省府社会处科长）陶世泽（原省府科长）负责总务等。”按一九五〇年三月田匪窜康时，我曾避往泸定磨西，没有参与杨仲华所组织的伪政务委员会，事关历史的真实，特请予以订正。

冯有志

1983年7月25日

附注：

《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一文，已在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期转载，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优秀奖。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第二輯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政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員會編
甘孜報社印刷廠 印刷

1984年6月第一版

印數：1—2000冊